

# 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

林麗江\*\*

【摘要】以規鑿為主要功用的版畫書籍在中國古代版畫之製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相關研究卻顯得稀少。製作與生產的脈絡乃至於規鑿成效的評估，或許可在文獻資料相對齊全的規鑿類版畫書籍的研究中有所突破。《養正圖解》原本是作為一本教育皇子的教科書，在經過仔細的分析後，卻顯現其中對於當時皇帝之規鑿意涵。這部版畫書籍不僅刊刻精美，本身即深具研究價值，更因為這個研究的進行，可與本人之前的另一本規鑿書籍《帝鑑圖說》之研究，形成有意義的對照。一方面可見到兩書對於萬曆皇帝的規鑿內容與其之後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可藉以觀察明代版畫在此時期之某些發展面向。這些探討或者也可為同類型的規鑿類繪畫，提供一參考的架構，使吾人對於規鑿類版畫或繪畫，甚至是敘事畫在中國晚期藝術史中之發展能有更深的理解。

關鍵詞：養正圖解、明代版畫、規鑿類版畫、敘事畫、焦竑、帝鑑圖說

## 一、前言

《養正圖解》是明代萬曆年間（r.1573—1620），擔任講官的大臣焦竑（1540—1620）為了皇長子教育所編纂之附圖規鑿類教科書。在本人先前有關《帝鑑圖說》一書之研究中，<sup>①</sup> 為了找尋其所源由的文本，逐漸發現一類專為

---

\* 本研究的完成要感謝國科會的計畫經費支持：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NSC 93-2411-H-003-035-）；以及兩位匿名審稿學者的寶貴意見，特此申謝。另外在找尋資料的過程，也特別感謝臺北的國家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圖書館、日本東京的公文書館、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英國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等單位的協助。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① 《帝鑑圖說》全書共收有歷史有名的聖主軼事八十一則，昏君暴主的劣跡三十六則。為使年幼登基的小皇帝瞭解以史為鏡的歷史教訓，此書以頗為淺近的文字寫成，更重

教育太子或親藩而編著的書籍，而《養正圖解》即為此種書籍中之一例。本文將以《養正圖解》為研究之重心，並輔以先前有關《帝鑑圖說》之研究，以便能對此類書籍有更深入之了解。為皇家特別是皇子所作之教育書籍帶有規鑒意涵的，上可追至漢唐，<sup>②</sup> 但是目前並未發現漢唐時期配有圖畫的記錄。迨到宋朝，在印刷發達的風潮下，規鑒事例配上插圖的書籍出現，似乎是必然之勢。<sup>③</sup> Julia Murray於其研究中指出，宋仁宗（r.1010—1063）時所編的《三朝訓鑑圖》，是現存文獻上記載最早印刷且附圖之規鑒書籍。<sup>④</sup> 只是，目前存世作品中，似乎並無早於明代之例。清光緒（r.1875—1908）年間，宮廷發下一本元代王恽（1227—1304）所作的《承華事略》鈔本一冊，著南書房翰林每段將其義而配圖。據四庫群臣所考，此書在元代原即有圖，清宮所收之版本為後世之

---

要的是每則皇帝的歷史故實之前還附有一圖，以便能「觸目生感」。原書應該是手繪而成，後來也出版成書，相當受到歡迎，甚至在萬曆元年就有私人刊本行世，乃根據張居正獻給神宗皇帝的本子改製而成。隨後更有眾多其他版本被印製出版，目前在許多公私立的善本書收藏仍留有不少之明刊本。另外，1604年還有金濂刻本出版，此書雖然根據同樣的文字，但是卻重新製作了一套新的插圖。《帝鑑圖說》之相關研究甚多，是目前規鑒類版畫中研究最多的，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321-359. 本研究中，若無特別言明版本，引用《帝鑑圖說》內容時，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之明代郭庭梧刊本為主要依據，詳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1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 ② 譬如賈宜（200-168 BCE）似乎就編有類似的書籍以教育漢代皇族，而唐太宗更編有《帝範》一書來教育皇子，參見王鏡輪，《做一個皇帝讀書郎：從太子到天子的學習之路》（北京：華藝出版社，2005），書中羅列敘述了歷代眾多的皇子教科書。
- ③ 例如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在宋代即有配圖。見山崎純一，《列女傳》（東京：明治書院，1996-1997）。有關規鑒類皇家教育書籍且配有插圖之研究，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David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231-268.
- ④ 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Illustrations in Printed Books,”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A., C.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418, note. 6.

鈔本，因而無圖。如果四庫群臣所言不虛，則此書為元代少數配有圖繪的皇家童蒙之書，然而今所存者則為光緒時重新補圖的本子。<sup>⑤</sup> 如此一來，萬曆初年的《帝鑑圖說》即成了皇家教材規鑒類書籍中，現存圖文相配之最早例證。

若將《帝鑑圖說》置於皇家教材傳統中，來看它的歷史定位，或可從書的編排與內容反推皇家的教育方式，與當時人臣如何以規鑒類的版畫來教育帝王、太子，從而施行其政治抱負。以《帝鑑圖說》而言，這本書的編成其實隱含了許多編者的苦心，除了原本的教育帝王功能，主導編纂的張居正（1525—1582）還將許多重要的「訊息」置入此書，希望能藉此消弭日後因輔政所必然帶來的禍害。同時，不只是運用此書的文字敘述，透過插圖，張居正也成功的導引萬曆皇帝模仿漢唐君臣的賢良事蹟。因此，文字與插圖共同傳遞了重要的訊息。只是之前的研究者往往著重於文字事例的解讀，卻不曾深入探討插圖可能承載的意義，以及可形成的效用。<sup>⑥</sup> 而這類原為手繪手抄之宮廷規鑒版畫在獻給帝王之後，往往也刊刻成書，而成為坊間廣為流行的版本。從這些書籍的流行來看，固然一方面說明了當權者權勢之盛，但是也往往顯示了晚明消費市場似乎對於此類書籍有其愛好。<sup>⑦</sup>

在規鑒版畫之前，規鑒類繪畫即已被凸顯而作為一可被探討的主體。然而受重視的程度相較於文人畫類仍有所不足，因此相關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均有待加強。譬如著名的中國古畫《女史箴》圖，學者在過去一世紀的眾多研究中，仍然無法確定其真正的用途與使用的可能成效，因此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畫作的基礎研究，以及探索其敘事畫技巧的討論中。<sup>⑧</sup> 美國學者Julia Murray

<sup>⑤</sup> 現代的重印本見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冊14（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

<sup>⑥</sup> 在本人的研究中，即針對編排的內容以及書中文字與圖繪各自承載的意義，有深入的討論，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p. 321-359.

<sup>⑦</sup> 明代有眾多的配圖之教化書籍的出版，譬如《閩範》、《列女傳》等，有些教化的功能也含在童蒙書籍中如《日記故事》等書。

<sup>⑧</sup> 最近的一批研究，可參考Shane McCausland et al., *First Masterpiece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Admonitions Scroll*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2003);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deals of Etiquette, Art and Empire from Early Chin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ns Ltd, 2003).

可說是目前對規鑒畫類著力最深者，曾出版多篇研究與專書討論規鑒類繪畫與版畫。<sup>⑨</sup>另外，石守謙也曾撰有〈南宋的兩種規鑒畫〉一文，以規鑒畫在南宋的特殊發展，回視此一傳統在南宋之前的表現，文中探討了規鑒內容的傳達、規鑒方式依被規鑒對象的不同而形成的差異，以及規鑒圖繪如何為執政者所轉化，成為一種宣示聖者帝王的表徵，而逐漸失去其規鑒的作用。<sup>⑩</sup>這些研究中所曾討論過的問題，與精闢的論點，均可作為檢視規鑒版畫的參考。Julia Murray亦試著將規鑒圖繪置回被生產的背景中加以檢視，以便解釋畫作的內容與意義。然而畫作實際被使用的脈絡、其規鑒的成效、甚且實際生產的狀況，往往因資料的缺乏，而無法更進一步的討論。上述石守謙的研究，也主要建基於畫作被視為一種文本，在仔細的「文本閱讀」下，進行畫作詮釋所得的成果。規鑒畫作真正被使用的脈絡、規鑒的成效，仍然是較難被具體呈現的部分，但卻是吾人瞭解此一畫類所亟於解決的問題。

《養正圖解》的研究並不多，較為深入的是Julia Murray之相關系列研究，他在一篇討論規鑒圖繪的文章中將《帝鑑圖說》、《養正圖解》與孔子相關的《聖蹟圖》並置而觀，希望經由這三種規鑒材料來觀察這些登載於版畫、繪製於畫卷和刻製於碑版上（日後可以加以拓印流傳）的圖繪，如何在不同的媒材上而有不同的變化與用途。在這當中，他簡要的處理了《養正圖解》的刊行與版本問題，指出有吳懷讓刊本與玩虎軒刊本，並認為丁雲鵬（1547—1628）所構思的版畫給予後來畫家靈感，而後有繪畫產生。<sup>⑪</sup>在另外的研究中，他則特

---

⑨ 近年來Julia K. Murray自南宋宮廷所製作的政治宣傳畫，逐漸擴及至教化規鑒畫類，研究的畫作包括詩經、女孝經、迎鑾圖、中興瑞應圖以及孔子與其弟子的肖像等，亦曾發表過關於《帝鑑圖說》的論文，詳見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Teikan zuset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2001), pp. 65-101; Julia K. Murray,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e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vol.12, no.1 (Spring 2006), pp. 20-67; Julia K. Murray, "Didactic Illustrations in Printed Books," pp. 417-450.

⑩ 石守謙，〈南宋的兩種規鑒畫〉，《藝術學》1期（1987.03），頁7-39。

⑪ Julia K. Murray, "Didactic Illustrations in Printed Books," pp. 427-433. 此外，Murray也將這些相關的論述寫入他的另一本書，有關《養正圖解》的部分見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別比較了上述兩種書籍版本的差異，並確定吳懷讓本才是原先最早的製作。<sup>⑫</sup> Murray的研究，釐清了環繞著《養正圖解》製作的基本問題，並指出大致上的版本差別。基於他對規鑒圖繪研究的興趣，Murray也特別搜羅整理了此類用來教育皇子的講讀資料，他詳查古代相關文獻的歷史，也蒐集明代此類的講讀資料，並集中討論兩本不同的《聖功圖》、《帝鑑圖說》與《養正圖解》，成為少數深入討論明代皇子教育材料的基礎之作，<sup>⑬</sup> 對於日後研究提供了相當厚實的基礎。

本文一方面承繼之前本人在《帝鑑圖說》研究中，所特別關注的製作與使用的議題，一方面也希望能在Murray已經相當充實的研究上，繼續深入探討。在調查中發現《養正圖解》的版本，其實比之前瞭解的複雜，因此下文會針對這個部分，加以說明。在釐清了版本的狀況後，對於《養正圖解》的刊行，或許能有更清楚的理解。除此之外，仍有不少問題值得深入的探討，特別是焦竑編集此書的真正用意到底為何？真的只是單純的作為皇子的講讀用書嗎？背後可有任何隱晦的政治主張與意圖？

---

Hawai'i Press, 2007), pp. 100-105. 另外尚有碩士論文討論《帝鑑圖說》與《養正圖解》之收羅內容與教化意涵並概略論及版本問題，見莊慧敏，《《帝鑑圖說》與《養正圖解》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2004）。臺灣的藏書家袁芳榮先生也在他的部落格中針對《養正圖解》亦有所闡述（2011/9/21），詳見袁芳榮，〈故紙堆蠹魚（部落格）〉，查閱於2012/8/15：<http://www.wretch.cc/blog/fryuan1954/12366991>。本文在國科會計畫執行完畢之後亦有簡要報告（2007/2/18），主要討論《養正圖解》編成之背景，並附有版本調查結果，可自國科會網站查閱與下載<https://nsce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本文在簡要報告的基礎上，更加深入探討，當然也受惠於近年來的其他研究，特此說明。

⑫ 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in Ming Wilson and Stacey Pierson ed.,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Colloquy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23*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6), pp. 139-157.

⑬ 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David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231-268.

同時，此書插圖的成就，更少為人所觸及。雖然出版於南京，但是由於《養正圖解》的繪圖者與刻工都來自徽州，應該可以視其為所謂的「徽派」風格的版畫，後來的玩虎軒本也是徽州刻工所為，兩者同為「徽派」版畫，<sup>⑭</sup>然而風格卻不盡然相同，透過這些頗為類同的版畫比較，或許可以幫助吾人釐清所謂徽派風格的某些特色。此外，作為《養正圖解》的繪圖者，丁雲鵬又是如何以圖繪去詮釋焦竑所哀集的歷史故實呢？丁雲鵬的敘事手法有何特出之處？文章最後試著將《帝鑑圖說》與《養正圖解》並置同觀，見出這兩本規鑒圖書，對於萬曆皇帝重點各自不同的規鑒，並探討二書在晚明的政壇曾有的影響。

以規鑒為主要功用的版畫在中國古代版畫的製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相關的研究卻顯得稀少。<sup>⑮</sup>製作與生產的脈絡乃至於規鑒成效的評估，或許可在文獻資料相對齊全的規鑒版畫書籍的研究中有所突破。而《養正圖解》正是在《帝鑑圖說》之後的另一本值得詳究的規鑒類版畫。這部版畫書籍不僅刊刻精美，本身即深具研究價值，更因為這個研究的進行，可與本人之前的另一本規鑒書籍《帝鑑圖說》之研究，形成有意義的對照。一方面可見到兩書對於萬曆皇帝的規鑒內容與其後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可藉以觀察明代版畫在此時期之某些發展面向。這些探討或者也可為同類型的規鑒類繪畫，提供一參考的架構，使吾人對於規鑒類版畫或繪畫，甚至是敘事畫在中國晚期藝術史中之發展能有更深的理解。

---

<sup>⑭</sup> 所謂的「徽派版畫」基本上應該是指稱在徽州地區所生產的版畫，在此基本上泛稱一群由來自徽州地區的刻工及徽州出版家在十七世紀初左右所生產的版畫而言，有關明代版畫的區域風格問題，礙於本文關注的重點，與目前研究的成果，仍無法在此有更為具體的論述，希望日後可以針對此一議題加以深入探討。其他有關徽派版畫風格的初步論述亦可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sup>⑮</sup> 較引人注目、也較有成績的是日本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於1990年所辦的展覽，在展覽圖錄中，有兩種不同版本的《帝鑑圖說》版畫之完整刊出，亦有相關研究論文探討，詳見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町田市：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90）。另外，日本學者小林宏光也有一篇精彩的論文，探討在異文化中規鑒的內容如何被淡化，而終至成為展現異國情調的「風俗畫」，詳見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1990.2），頁11-31。

## 二、《養正圖解》的編纂

作為一本附圖的規鑒書籍，《養正圖解》並非特例。宋代即有臣子編纂規鑒書籍獻於皇帝的事例，<sup>①⑥</sup> 元代也有《承華事略》的編纂。<sup>①⑦</sup> 且明代自開國以來，皇家也編有相當多的規鑒書籍，分別當作皇子親王教育的教材，或是分送給各藩王、外戚等，作為行為規範依循之標準。如明太祖（r.1368—1398）編有《昭鑒錄》、《永鑑錄》、《公子錄》等，其中《昭鑒錄》採錄漢唐以下藩王善惡為鑒誡，以訓諸王，書可分為「善為可法」與「惡為可戒」二部分，正是後來《帝鑑圖說》編排方式的祖型。而後仿此體例，明宣宗（r.1425—1334）編有《臣鑒》、《外戚事鑒》，景帝（r.1449—1457）編有《歷代君鑒》，<sup>①⑧</sup> 此書即為《帝鑑圖說》文本的主要來源。<sup>①⑨</sup> 在這樣的傳統下，由臣子編纂上書的規鑒圖籍在明代則顯得較不尋常。

無論是《帝鑑圖說》或是《養正圖解》都是臣僚獻給萬曆皇帝（r.1573—1620）的書籍，不同的是前者一開始就相當受到重視，而後者則為萬曆所冷落。萬曆初登基（1573）時，年方十歲，首輔張居正獻上《帝鑑圖說》，企能收到教育聖主之功，而萬曆皇帝果然也十分能體察張居正的美意，因此特飭令道：「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

<sup>①⑥</sup> 如范祖禹在宋元祐初年所編之《帝學》，即甚為四庫諸臣所稱道；見〈帝學八卷〉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91，子部1，儒家類1，頁30b-31b，查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sup>①⑦</sup> 王惲，《欽定元王惲承華事略補圖》，收於劉托、孟白編，《清殿版畫匯刊》冊14（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Murray也詳細的追溯了中國古代此類的文獻，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p. 233-235.

<sup>①⑧</sup> 明代皇室所編纂的教科書甚多，這部分的資料，由於Murray已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在此只是簡要的列出，可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p. 235-239. 在本人的研究中，亦在文後的附錄列出這些相關的圖書，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Appendix A.

<sup>①⑨</sup> 我比較了兩本書，發現景帝時編的《歷代君鑒》很可能是張居正主導群臣編纂《帝鑑圖說》時的主要文本參考來源，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 330.

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禮部知道。」<sup>②①</sup>但是，萬曆二十五年（1597），當焦竑編纂的《養正圖解》終於被呈給皇帝，希望可以作為皇長子的講讀教材時，萬曆卻只有冷冷的回應：「知道了。所進《養正圖解》留覽，並賜了。前有旨，皇長子體質清弱不耐久勞，講學書籍候循序漸進，以副朕眷愛之意，禮部知道。」<sup>②②</sup>何以這之間有如許的差異？現在看來，這一切或可歸因於萬曆對張居正的失望，在張居正死後，他才深刻理解這位首輔並非如此的表裡如一，致使他日後對政治的冷感，再也無法如此信任臣僚，<sup>②③</sup>更不用說是臣僚再度仿照張居正所為，又獻上自編之鑑戒書籍。

然而，更關鍵的當是他對皇子立儲的態度。據黃仁宇的研究，萬曆十八年（1590），皇長子常洛（1582—1620）已是虛歲九歲，但是卻尚未出閣講學，因為出閣講學需要有太子的名分，而萬曆遲遲不肯立皇太子，使得諸臣十分焦慮，於是聯合向當時文淵閣四位大學士施壓，希望萬曆可以儘早立長，然而都無下文。立儲一事又延宕多時，後來也因此導致多位首輔辭職。萬曆的藉口一是常洛太小經不起種種典禮的折磨，藉口二則強調立儲是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他人壓迫。甚而，後來在同一天冊封了三個兒子為王，卻仍不封太子。萬曆想立鄭貴妃（ca. 1568—1630）所生之子常洵（1586—1641）為太子，但礙於臣僚反對而持續作消極的抵抗，就是遲遲不肯冊封太子。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朝中

---

②① 張居正，《帝鑑圖說》序後所附萬曆之裁示，在眾多的《帝鑑圖說》刊本中均可見到。

②② 萬曆的裁示並未出現在較早期的刊本，但可見於《養正圖解》的宛委別藏本（抄寫本，很可能源自玩虎軒本），亦可見於清代光緒時的重刊本（主要根據吳懷讓刻本重刊）。參見焦竑，《養正圖解》，收入於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宛委別藏》v.62（臺北：商務，1981）。此處所用版本是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清代重刊本，見焦竑，〈養正圖解題奏〉，《養正圖解》（清光緒21年重刊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詳見China-US Million Book Digital Library Project (CADAL) 網站，2012/8/14查閱，<http://archive.org/details/02091790.cn>），頁2a。

②③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2001增訂版，首版1985），第二章，頁53-92。另外也可見韋慶遠，《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書中描寫了早期萬曆與張居正和諧的君臣關係（頁476-483）、張居正對於萬曆的苦心教導（頁483-497），以及最終君臣關係的轉變狀況（頁830-840），旁徵博引，十分深入。

官員也為此而紛擾不休。<sup>②③</sup>一直到萬曆二十二年（1594），常洛才僅以皇長子身份出閣講學，並不是以太子的身份出閣。焦竑時任皇長子的講讀官，歷經種種波折，方於萬曆二十五年獻上他所編之《養正圖解》。

焦竑是晚明時期相當著名的學者，<sup>②④</sup>以藏書與博學著稱。在萬曆十七年（1589）時考取狀元，於萬曆二十二年任東宮講讀官，並且為了講讀之需而編成了《養正圖解》一書。未料此書一出，即招致同朝的其他講官側目，認為焦竑沽名釣譽，希望藉此書而更上一層樓。有關此事，《明史》焦竑傳記的記載為：「竑嘗採古儲君事可為法戒者為養正圖說【解】，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1554—1612）惡其不相聞，目為賈譽，竑遂止。」<sup>②⑤</sup>當時反對最激烈的是同為東宮講讀官的郭正域，沈德符（1578—1642）對於此事也有記載：「至今上乙未年（1595），皇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為講官居末，亦進養正圖說【解】一冊。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諭為講官之長，大恨怒之。次輔張位（1538—1605）亦恚甚，至焦丁酉（1597）為北京副考，遂借場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sup>②⑥</sup>由上述資料可知，一開始焦竑似乎並沒有真正的進書成功，並且因此事而受到其他官員的排擠，日後他們更進而假借事由迫使焦竑罷官致仕。

雖然如此，這本書很可能是在萬曆二十二年，被刊刻上板。<sup>②⑦</sup>從目前的資

②③ 有關萬曆遲遲不肯立儲且用消極方式對抗的部分，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三章，頁93-131。

②④ 有關焦竑的生平與著作，見李劍雄，《焦竑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許建崑，〈焦竑文教事業考述〉，《東海學報》，34卷（1993），頁79-98。李焯然，〈焦竑之史學思想〉，《書目季刊》，卷15期4（1982.03），頁33-46。另外亦可參考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Yü, Ying-shih,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ited," *Ming Studies* 25 (Spring, 1988), pp. 24-66 (43).

②⑤ 張廷玉等著，〈焦竑傳〉，《明史》v.24（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88，列傳第176，文苑4，頁7393。

②⑥ 沈德符，〈宗藩/聖功圖〉，《萬曆野獲編》v.1（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4，頁102-103。

②⑦ 沈德符上文所說的皇長子出閣講學的時間，似乎與《養正圖解》的序文所言有所差異，無論是祝世祿或是焦竑自己，提到皇長子出閣講學都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詳見祝世祿，〈養正圖解序〉，《養正圖解》，頁1a-3b；焦竑，〈養正圖解序〉，《養正圖解》，頁

料顯示，不管其他官員如何不滿，焦竑最後還是輾轉將此書進獻給了萬曆，並且在萬曆二十五年的九月初八日獲得萬曆的聖旨裁示。<sup>⑳</sup> 根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記載，此書的進獻頗有些原委：

《玉堂叢語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仿《世說》之體，採摭明初以來翰林諸臣遺言往行，分條臚載，凡五十有四類，而終以讎隙。案朱國禎（1557—1632）《湧幢小品》曰：「焦弱侯率直任真，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太倉相公謂宜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無何太倉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纂《養正圖說【解】》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為之，奈何獨出一手？後其子攜歸，刻於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璫陳矩（1539—1607）適至，取去數部呈御覽，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圖大拜。又載其序呂坤（1536—1618）《閨範》，鄭國泰（fl. ca.16th 下半—17th 上半）乞取添入后妃一門，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作序云云。」竑作是書，以讎隙終篇，蓋感此二事，借以寓意。然陳矩為司禮太監，鄭國泰為貴妃之姪，何以二書適入二人之手，俱得進於宮禁？當時物議，實有其因，未可盡委之排擠也。<sup>㉑</sup>

從朱國禎的記載得知，王錫爵（1534—1614）要講官編輯通俗易曉的講本進覽，但是在王錫爵致仕後，諸講官無人在意，唯有焦竑編纂了此書，反倒惹得群臣不悅。值得注意的是，朱國禎提到：「後其子攜歸，刻於南中。」表示一開始，這本書應該也是一本手抄與手繪的書籍，後來才由焦竑的兒子在南京出版，並且由宦官陳矩把刊印成的《養正圖解》給取了去，獻給萬曆。如果再以焦竑的《恭進圖解以仰禪諭教疏》一文並觀之，我們或者可以推測，陳矩見到這些書後，便要焦竑上疏進獻，疏中焦竑明白陳述之所以要進獻此書的用

---

4a-5b。本研究註釋所引用的《養正圖解》版本，除非特別表明，一概使用中國國家圖書館所重新影印複製的明代刊本，此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索書號16750本。參見焦竑，《養正圖解》（影印明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

⑳ 萬曆的裁示被刊於焦竑的題奏之後，見焦竑，〈養正圖解題奏〉，《養正圖解》（清光緒21年重刊本），頁2a。

㉑ 見〈玉堂叢語八卷〉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3，子部53，小說家類存目1，頁34b-35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意。<sup>⑩</sup>雖然，我們可能也無法排除清代四庫館臣的懷疑，認為可能是焦竑藉由結交內臣，才夤緣得以把書獻上留覽。如果後者成立，則焦竑的疏文是自己早撰寫好了，並托宦官將書冊獻給萬曆。焦竑曾在內廷教導宦官讀書，的確可能與這些內廷中官有著較好的關係。<sup>⑪</sup>

沈德符也詳述了後來焦竑所受的攻擊，進而感嘆時值亂世，著書立言也得謹慎。萬曆二十五年焦竑因為主持南京鄉試被彈劾，後來焦竑所遭受的攻擊，不謂不猛烈，沈德符就說道：「又如焦弱侯太史，不過一木強老書生。丁酉年被劾時，給事楚人曹大咸者，至目為莽、操、懿、溫，徒取有識掩口，更誰信之？」<sup>⑫</sup>顯然，彈劾焦竑的人，把他與歷史上一干表面溫良其實居心叵測者相提並論。對此，沈德符頗不以為然。《萬曆野獲編》中錄有不少與焦竑相關的記載，主要是因為沈德符的父親與焦竑素有往來，甚至焦竑在尚未考取狀元之前，也常到沈德符家中閱書、抄書，有時沈父甚至就將卷帙浩繁的書籍直接給了焦竑，免去其抄錄之苦。<sup>⑬</sup>因而，沈德符應該是瞭解焦竑的狀況與為人，其記載應是較為翔實、可靠者。

《養正圖解》一書的內容，共有六十則故事，先圖後文，其後附有更為直白的解釋。如同張居正所做的《帝鑑圖說》，原是作為皇帝的經筵講學之用書，但是在書中卻有張居正刻意的安排；<sup>⑭</sup>《養正圖解》的內容編排，也似乎隱含了焦竑特別的用意。這本書不單是要作為皇太子的教學用書，似乎也可能

<sup>⑩</sup> 焦竑，〈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疏〉，收於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3，頁14-15。疏文就是後來刊本中的題奏，見焦竑，〈養正圖解題奏〉，《養正圖解》（清光緒21年重刊本），頁1a。此疏並未見於明代的幾個較早的《養正圖解》刊本中，有可能是後來的刊本根據焦竑之著作所刊入者，詳見附錄二。而根據這個疏文，也可知道這是為了上呈《養正圖解》所寫，從萬曆回覆的時間來判定，焦竑寫此文時，約為萬曆二十五年（1597）。

<sup>⑪</sup> 焦竑曾經在內廷為宦官們講過課，他的理由是這些人都要隨侍皇族，因此對他們的教導相當的重要。可以想見，如果因此而跟宮中的太監有著較好的交情，也不足為奇。見張廷玉等著，〈焦竑傳〉，《明史》v.24，卷288，列傳第176，文苑4，頁7393。

<sup>⑫</sup> 沈德符，〈內閣/大臣被論〉，《萬曆野獲編》v.1，卷8，頁222。

<sup>⑬</sup> 沈德符，〈科場/師弟相得〉，《萬曆野獲編》v.2，卷14，頁377。

<sup>⑭</sup> 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p. 321-359.

有藉此來勸誡萬曆之意圖。這樣的訊息在其疏文中透露出來：「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為《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為宗社長久計也。」<sup>35</sup>

鄭紀（1438—1513）、鄒守益（1491—1562）、霍韜（1487—1540）又是何等人呢？前者為明孝宗（r.1487—1505）時大臣，後二者則為嘉靖（r.1522—1566）時的臣子，恰巧的是，前後的兩組人馬，均為了皇太子做有同樣名為《聖功圖》的教材。鄭紀特別在弘治八年（1505）時進獻了《聖功圖》，蒐集了百餘條故事加以圖繪，以作為皇太子講讀之用，《明孝宗實錄》對此事亦有詳載：

壬戌，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且言：太祖高皇帝嘗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以充伴讀，誨以崇德尚齒尊賢之道。太宗文皇帝亦有大華寶鑑之賜，又命皇太孫遍覽農具，欲令知小民稼穡艱難。今皇太子既正儲位，教法未立，加冠有期，宮臣未備。臣謹采前代并聖朝儲君童冠受學踐阼等事，凡百條。每條摘其事實，圖畫於前，又錄其出處，斷論於後，取易蒙卦之義，名曰：聖功圖。伏望宣付東宮講官，以備講讀，庶皇太子見此圖畫，必樂觀而易曉。講官因此圖畫可以指示而解說，然後次第以及經書字史，以廣其見聞，則教法立矣。復選六卿有德望者兼宮臣師保之職，別選儒臣方直骨鯁者補一府兩坊之缺，以內閣大臣領之，俾更番侍直，其近侍內臣亦必慎選年四五十以上，讀書知理質朴敢言者充之，不用少年新進浮薄之人，亦以司禮監官領之，則宮臣備矣，下所司知之。紀所上圖，飾以金碧，將取悅禁中，謀為宮僚，聞者恥之。<sup>36</sup>

<sup>35</sup> 焦竑，〈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疏〉，《澹園集》上，卷3，頁14-15。Julia K. Murray也已在他的文章中提及有關聖功圖的相關事由，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p. 240-242. 在本人的帝鑑圖說文章中也曾簡要的觸及此議題，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 329, note. 19.

<sup>36</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1966），冊3，卷105/弘治8年10月，頁1915。亦見鄭紀，〈進聖功圖說以輔養皇儲〉，《東園文集》，卷3，頁8b-13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鄭紀原文甚長，《明孝宗實錄》只收錄其中一小部分。

鄭紀的《聖功圖》「飾以金碧」<sup>37</sup> 被認為想要討好未來的太子，而嘉靖諸臣鄒守益、霍韜在大禮議之爭時，獻給皇帝的《聖功圖》圖冊，嘉靖認為圖文涉及譏諷，因此諸臣均遭斥責：「是時，九廟七陵工費靡極，乃與諭德鄒守益上《聖功圖》以諷，帝怒詰責，尋察其忠懇，原之。」<sup>38</sup> 明史中也記載：「……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閣，乃與霍韜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為圖十三。帝以為謗訕，幾得罪，賴韜受帝知，事乃解。」<sup>39</sup> 的確，全本《聖功圖》十三幅，就有將近八幅圖是用來勸誡皇太子要節儉，相較之下，其他德行則著墨甚少。也因此惹得嘉靖皇帝甚為不悅，認為是對他大興土木建築陵廟的一種譏諷。

《萬曆野獲編》對於前後的兩本《聖功圖》，以及焦竑編纂出版《養正圖解》之始末，有更清楚的記載：

弘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于皇太子。蓋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儲宮自童冠至登極，凡百餘事。前用金碧繪為圖，後錄出處，己之論斷于後。時謂紀曾任祭酒，以不稱調南京，至是謀為宮

③7 有關此圖冊的「飾以金碧」，Murray推測可能接近約略同時代的崇善寺畫卷之風格，跟西藏地區的佛教繪畫所使用的顏色接近，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 240 and note. 31. 我也注意到另外有一本很可能是明代宮廷所製作的手繪書：《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書中也有設色相當豔麗的插圖，重彩加上泥金上色，這些《聖功圖》也有可能是以這樣的圖繪色彩製作，目前上卷藏於臺北的故宮博物院，下卷藏於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藏本有現代複製品：宋代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上卷（據明代內府刊本複製，臺北：世界書局，2009）。

③8 詳見〈霍韜〉條，《廣東通志》，卷45，頁27b，《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聖功圖》本身即為可待研究的材料，惜現已不存，只有文字資料可資研究。另外，有關聖功圖的內容Murray則使用了霍韜的《渭涯文集》（日本內閣文庫本），卷4，頁62b-65b，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 242 and note. 39.

③9 詳見張廷玉等著，〈鄒守益傳〉，《明史》v.24（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83，列傳第171，儒林2，頁7270。不過在另一條資料中，《聖功圖》亦被稱為《東宮聖學圖冊》：「莊敬太子載，世宗第二子。嘉靖十八年，世宗將南巡，立為皇太子，甫四歲，命監國，以大學士夏言為傅。尚書霍韜、郎中鄒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疑為謗訕，幾獲罪」，詳見張廷玉等著，〈世宗諸子/莊敬太子條〉，《明史》v.12，卷120，列傳第8，諸王5，頁3646。

僚，故有此舉。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聖功圖一冊上之。謂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詞陳說。唯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為養正之助，乃自文王為世子而下，繪圖為十三事，且各有說。上云圖冊語多曲隱，假公行謗，無人臣禮，下禮部參看，既而命宥韜等罪，其冊疏廢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為講官居末，亦進養正圖說一冊。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諭為講官之長，大恨怒之。次輔張位亦恚甚，至焦丁酉為北京副考，遂借場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後三朝四公，皆以納忠東朝，被疑受譴。若鄭紀者固不足言，霍渭先、鄒東廓，皆一時名士，何以亦有是獻，且書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抑承襲為之也。易經一蒙卦，誤人乃爾。霍、鄒二人，尋俱入為宮僚。<sup>④①</sup>

從上述記載得知，鄭紀獻書被認為是希望可以謀求成為宮僚，此舉遭到他人的恥笑；霍韜與鄒守益則被嘉靖認為是以書冊諷刺時政，也差點因此獲罪。在沈德符看來，這種上書冊對皇太子輸誠或是藉以譏諷時政的作法，並不值得嘉獎。文末又記載霍韜與鄒守益，上書後不久，果然成為皇太子的宮僚，頗有一種譏諷之意。至於焦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呢？沈德符認為應該只是循例而為吧，對於焦竑，沈德符的批評仍然是比較客氣的。

行文至此，約略可以勾畫出《養正圖解》編纂的原委，焦竑遵照王錫爵所示，要編纂一本童蒙讀物，以便作為皇長子講讀之用。博洽多聞的焦竑參照了前朝的事蹟，而編成了《養正圖解》一書。如果對照之前的事例，這些上圖書者莫不想藉此謀求親近未來的皇帝，一旦成為帝師，將來的前途的確不同凡響。因此，上述前朝的幾位官員，莫不有此舉動。但是焦竑本來就是講官，為何又有這樣的舉措？沈德符只是淡淡的評說這可能是循例而為，但是這樣的舉動卻引來其他講官的不滿。

雖說在表面上，同僚之不悅是因為焦竑「不以商於同事」，但是事實上恐怕不是如此的單純。焦竑的這種循例，未免令人有其他的聯想，其一是當時的爭立皇太子之事鬧得沸沸揚揚，焦竑是書援引的前例，均是前朝獻於皇太子之書，那麼，如果萬曆真的接納了此書，是否代表萬曆已經默認當時的皇長子常

<sup>④①</sup> 沈德符，〈宗藩/聖功圖〉，《萬曆野獲編》v.1，卷4，頁102-103。

洛為皇太子呢？亦即，表面上說是如同前朝的講讀大臣一般，獻上講官自己所編纂的圖書，但實際上卻可能希望藉由萬曆接受此書，等同默認皇長子為太子之事實。果是如此，焦竑豈不立了頭功？這樣一來更顯得其他大臣不像他為了立太子如此的盡心盡力，難怪同為講官之其他官員要憤慨他獨自行事，使得焦竑的《養正圖解》一開始就不被同僚所認可。

### 三、《養正圖解》的版本與風格

即便不為同事所諒解，焦竑的《養正圖解》在南京一出版，即造成轟動，根據沈德符的記載，可以看到這部書在南京出版時所引起的騷動：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竑為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解】》進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為講員之首，已不悅之極。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為奇貨。大璫陳矩購得數部，以呈上覽，於是物議闐然。而張新建（1538—1605）相公與郭江夏尤怒甚，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丁酉（1597），焦又不幸承乏典試，遂借闈事撫拾之，調外去。己亥（1599），復中之，大計浮躁降調。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啟事，而議者終求多，至今未起也。同時則呂新吾坤初撫山西，著閨範一書。尋入為協院副憲，其書偶為戚畹鄭國泰所睹，進之翊坤宮。皇貴妃極喜其議論，因為作序，刻之京師。尋兩黨構爭，言官遂指呂懷二心，別有推戴。呂時已徙少司寇，亦因此乞身歸，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然尚未出山也。兩公俱當世羽儀，焦以博洽冠世，呂以理學著名。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樸誠，俱遭忌口，動以宮闈見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愆慎，況其他乎。按焦書曾進呈，奉旨留覽，呂書僅行人間，鄭氏偶見而賞之耳。<sup>④</sup>

雖然，《養正圖解》並未如《帝鑑圖說》一般在晚明的宮廷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然而一如沈德符所言，因為製作精美，旋一刊刻，就造成轟動。實在是因為丁雲鵬繪稿的生動與圖文詮釋的用心，加上徽州刻工雕製的精美，使得

<sup>④</sup> 沈德符，〈著述/呂焦二書〉，《萬曆野獲編》v.2，卷25，頁636-637。有關《閨範》一書的製作與來龍去脈，亦可詳見於〈閨範四卷〉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32，子部42，雜家類存目9，頁1b-2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此書被視為奇貨。造成聲勢，而後獲上呈，或許是無心插柳之故，焦竑也可能只是順水推舟。不過書顯然太過受歡迎，不久就有翻刻，即使現在仍流傳有不少版本。調查中發現，目前所留下來的明代版本，至少有三組不同的書板在印刷流傳，分別是萬曆二十二年的吳懷讓刻本（組A）、吳懷讓刻本之翻刻本（組B）以及玩虎軒本（組C）。進入清代則有蓋公堂本（組D）、阮元在嘉慶時期所獻之宛委別藏手抄本（組E），以及武英殿刊本（組F）。<sup>④</sup>而這些書板，個別又可能被增補、再出版。

組A被稱為「吳懷讓刊本」是因為祝世祿所寫的序文中，載明了幾位負責製作此書的人士：「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序，捐貲為吳懷讓，而鐫手為黃奇…」<sup>④</sup>因為吳懷讓為捐錢贊助此書完成者，所以學者稱之為吳懷讓刊本。組C被稱為玩虎軒本則是因為該版本的版心處，有「玩虎軒」的標示，知道是明代徽州書坊玩虎軒所出，書坊主人汪雲鵬也出過許多精美的圖書。明代的三種版本，也並非一成不變，吳懷讓刊本的板片，很可能在萬曆二十五年之後，轉手他人，同時增加了目錄，又持續的刊印。組B的翻刻本似乎在吳懷讓本出版後不久便出現，而且是相當高水準、亦步亦趨的翻製，但是在詳細的比對之後，仍然可以看到翻刻者線條的質感與表現力，仍然是稍遜一籌。不過如果原來的刊本遺失，此版本幾乎可說具有「下真跡一等」的價值，如果沒有仔細的比較，幾乎看不出是翻刻本。<sup>④</sup>此一現象頗為特別，因為大部分的翻刻本，基本上是

<sup>④</sup> 詳見附錄二有關《養正圖解》的各版本。本人也曾至韓國翻閱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所藏的《養正圖解》韓國重刻本，感謝文貞姬教授的協助與奎章閣圖書館的惠予觀覽，特此申謝。

<sup>④</sup> 祝世祿，〈養正圖解序〉，《養正圖解》，頁3b。有關刻工黃奇，所知不多，而且學者懷疑可能是黃德奇，詳見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0 and note. 6.

<sup>④</sup> 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所編輯的書志稿中，也提到該館所藏的三個善本間的關係，這三個版本的比較，詳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第一冊（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頁101。書志指出臺北05654本與05655本為同一組板片所印，與臺北05656本有所不同：「此本（05656）與前二書（05654, 05655）似為同一版刻，而繪圖線條較深，也較為清楚；唯若細加比對，其內文字畫、神韻偶有差異，不知係同一版刻加以修版，亦（抑）或係覆刻者。」（頁101）。本人的調查中也發現板片之不同，但是05654本與05655本品質不如臺北05656本，詳加比較下，可看出是翻刻本，因而將此二本編入組B。

為了牟利，何書暢銷，便加以翻製，以便趁機賺取利益，如此「精美」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翻刻本，似乎並不多見。<sup>④⑤</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玩虎軒本，此本乍看也與吳懷讓本很接近，但是基本上是根據了原本又重新構圖刊刻者。<sup>④⑥</sup> Julia Murray曾大致比較過兩個版本，指出兩個版本的許多不同之處，例如吳懷讓本在插圖上有故事的四字榜題、玩虎軒本則無，但是在版心上有「玩虎軒」標示，吳懷讓本主要以寫刻體來印製內文，但是玩虎軒則是使用匠體（所謂的印刷體），他也指出玩虎軒本在插圖上常有

④⑤ 譬如《新鐫海內奇觀》就有翻刻本，但是翻刻的功力遠遠不及原本，因此相當容易察覺。但是本人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觀覽吳懷讓本的翻刻本（國家圖書館索書號05654）時，就差點將其誤以為吳懷讓的原刊本，另外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有同樣翻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A01273）。然而，因為中國版畫的研究仍然太少，明代翻刻書籍實際的狀況如何，也許還有待更多的研究來釐清。目前討論此種亦步亦趨的精美翻刻現象的研究，還可見於鄭婷婷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就中他也發現有此種例子。詳見鄭婷婷，《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版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④⑥ 在Julia K. Murray比較新的文章中，他似乎傾向認為玩虎軒本是剽竊自他人的版本，而非汪雲鵬所新創的刊本，他之所以持此看法，似乎是因為阮元所獻的宛委別藏本，與玩虎軒本近似，但是在版心的部分卻有標出每一則故事的題目，而玩虎軒本則無，其版心的部分只有「玩虎軒」的標示。Murray認為汪雲鵬為了要讓出空間，將玩虎軒三字置於版心，因此把故事的標題去除。Murray認為如此一來，就使得前面的目錄失去作用，故認為「宛委別藏」本可能才是反映出真正原刊本的樣貌，詳見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pp. 256-258. 然而，目前可以見到的宛委別藏本都是手抄本，從圖繪形制上來看，的確與玩虎軒相近，不清楚阮元請人抄寫時是否為了閱讀者的便利，而將故事的榜題寫於版心上？檢查玩虎軒本的版式，如果汪雲鵬想要將榜題置於版心，其實還是有足夠的空間可以這麼做。不過，因為圖畫就緊跟在文字解說之前，也許汪雲鵬不特別覺得有必要標出榜題？此外，如果對照看文字的抄錄部分，宛委別藏本並不是所謂的「匠體」，雖然跟玩虎軒本在分行及字數上一致，可是抄錄者似乎並沒有特意仿玩虎軒的印刷體的字形。也就是說此本書在抄錄的時候，可能對於圖繪的抄錄比較嚴謹，因為圖像相當接近，但是文字的部分，則相對較為「鬆散」。當然，也不能排除玩虎軒本在「剽竊」的時候做了一些更動，因此Murray的考慮也不是全無緣由。不論如何，按照目前可見的證據，是否能據此說明玩虎軒本為翻刻自他本似乎還有待商榷。因此，在本研究中，基本上還是視玩虎軒本為一本以吳懷讓本為基礎的重新編刻本。

更多細節的描繪或是增添更多的人物。不過他也承認上述的那些不同點，似乎還不能全然的證明吳懷讓本是較早的刊本。<sup>④⑦</sup> 接著他又提出如果將視覺上的證據（上述的比較）與相關文獻綜合來看的話，應該可以得出吳懷讓本較早的結論。<sup>④⑧</sup> 本研究在將兩版本仔細比對後，基本上也同意Murray的結論，亦即吳懷讓刊本應該是原初較早的刊本。但是，所根據的理由卻是將兩本的插圖風格加以比較，且與丁雲鵬的其他版畫繪稿比較之後的結果，這個部分將在下文仔細論述。

在進入吳懷讓本與玩虎軒本的比較之前，還有另外一本在清代由曹鈞所重刊的蓋公堂本值得注意，鄭振鐸早就已經指出所謂的蓋公堂本其實是由玩虎軒本所重刊者。<sup>④⑨</sup> 然而果真是如此嗎？如果將兩者加以比較，譬如說〈膳斥鮑魚〉（第2則，頁3a）一圖，如果比較玩虎軒本（圖1），與藏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蓋公堂本（圖2），就可以看到兩個版本的確非常相像，基本上是來自同一組板片，只是前者較新也較完整，而後者則可能是因為刊印多本之後而有了較多的缺損。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其他的圖版上，例如玩虎軒本的〈金人示戒〉（第18則，頁35a）一圖（圖3）與蓋公堂本（圖4）相較，也可看出兩個圖版實出自同一刻板，前者完整，後者有較多的缺損。唯一較大的差別是玩虎軒本的插圖上並沒有榜題，而蓋公堂本則通常有長方形榜題出現在右上方。詳加比較，顯然是玩虎軒本的板片新增添了插圖的榜題，才成為被曹鈞重刊的蓋公堂本。雖然本研究未及收集到玩虎軒刊本，但是根據其已被刊行的幾張玩虎軒本圖版，<sup>⑤⑩</sup> 與蓋公堂本比較，確實可知，後者奠基於前者，使用了同一組板片。

上述的比較顯示，蓋公堂本就是用原來玩虎軒本的板片印製而成，只在小部分有些微的改動（加上榜題），因此接下來將使用蓋公堂本，與吳懷讓刊本

---

④⑦ 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p. 140-143.

④⑧ 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4.

④⑨ 鄭振鐸，《劫中得書續記》，收於《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374-375。

⑤⑩ 特別是Murray文中所刊出的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玩虎軒本的插圖，詳見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fig. 2, 4, 6, 8.

進行風格上的比較。此處以藏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蓋公堂本（下稱哥大本）作為玩虎軒本的代表，以組A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16750本作為吳懷讓本的代表（下稱北京16750本），兩相比較，可以清楚見到繪圖風格上的不同。首先，哥大本的人物多數都具有上圓而下微尖的完美鵝蛋臉型，如果以〈戒君節飲〉（第8則，頁15a）一圖（圖5）為例，無論是坐在屏風前面的齊桓公或是旁邊捧酒的侍者，都有著漂亮乾淨的鵝蛋臉型，只是齊桓公的臉稍長，而侍者臉較短而圓。相較之下，北京16750本的此圖（圖6），齊桓公有著橢圓但是上下稍方的國字臉，而其旁的侍者臉型也是接較為接近橢圓偏正圓的臉，下方還有多加一道短弧線以描繪下巴的畫法，主僕二人的臉型都不像哥大本一般的俊美，而是有著更多的個性的描繪。而類似的狀況也可在〈振貸貧民〉（第3則，頁5a）故事見到，哥大本插圖（圖7）裡端坐在上方的周文王臉型與圖5的齊桓公就頗為類似，都是上圓而下微尖的俊美鵝蛋臉型，位於其右方的侍者也同樣是這樣的漂亮臉型，而北京16750本的〈振貸貧民〉（圖8）中間的周文王臉型就沒有如此的秀美，甚至連五官也不像哥大本的文王如此的勻稱端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哥大本的主要人物，除了都是鵝蛋臉之外，還常被刻畫成眯眼與嘴角微微上揚的微笑狀，上述的兩圖以及其他的許多插圖都有這樣類似的表現，人物的臉型與表情幾乎可說是千篇一律。相較之下，北京16750本人物的臉型與表情，就有較多的變化，也較有個性。兩個版本顯然在人物相貌表現上的美感要求，不太相同。

此外，以衣紋線條而言，哥大本比北京16750本弧線更多，更加圓轉且多重複，往往不是為表現身體曲線所繪製的衣紋，也因此更趨於強調裝飾性。如同樣以〈戒君節飲〉為例，哥大本（圖5）在屏風旁邊正要將燭台移近齊桓公的侍者，右手的衣袖就形成許多圓圈，雖然北京16750本（圖6）的侍者也有類似的圈狀衣紋，但是哥大本的衣袖下擺的衣紋更加圓轉，且多為平行近似同心圓的弧圈，而北京16750本卻較為著重在描寫衣袖的垂墜感，因此形成的弧形較趨於長橢圓形，比較之下，哥大本此處的衣紋強調了線條圓轉的韻律感，使得衣紋更趨於圖案化。這種傾向在〈善言格天〉（第9則，頁17a）插圖中更加明顯，哥大本（圖9）左方指著天上的星宿，正在跟宋景公解釋天象的大臣子韋，衣袖在身體兩側形成兩組非常突出的多重圓弧圈，而北京16750本（圖10）的子韋，左手衣袖的下緣還有著方折的線條，不像哥大本如此的強調重複平行的圓弧，

而是更著重在表現衣袖的重量感與質感。

然而，如果仔細觀看，也會注意到北京16750本在某些地方會出現較多圓轉弧線的衣紋，不過通常都在人物衣裙的下擺，譬如圖10的子韋裙子的下擺就有數圈的圓弧線，看似平行，但最後集中到一點，以描寫裙擺的衣紋樣貌。在北京16750本的〈戒君節飲〉（圖6）前方正在規勸桓公不可飲酒過量的大臣陳敬仲，他的裙擺尾端也有三四圈的圓弧線。特別喜歡在衣袖或是衣紋上強調平行圓弧的哥大本（圖5、9），在裙子下擺的圓弧反而不像北京16750本如此強調。而且，北京16750本的此種表現，比較接近像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圖11），或是像元代衛九鼎仿顧愷之風格所做的〈洛神賦〉圖（圖12），特別強調那種在裙擺處圓轉連綿不斷的線條表現，也就是所謂的「春蠶吐絲描」的作法。亦即，丁雲鵬原來的圖畫設計，是有意識的運用古代大師之繪畫風格。即使哥大本也有少數人物的下擺有類似的表現，但這些可能是因為模仿丁雲鵬的構圖所致，哥大本（或說玩虎軒本）其實最在意的，還是在衣袖處重複圓轉的弧線，以便強調出線條的韻律感。

北京16750本除了在裙擺處會使用顧愷之較為圓轉連綿的線描風格外，大多數的人物畫，比起哥大的蓋公堂本，都顯得較有個性，且衣紋也較無圖案化的傾向。如果回到丁雲鵬更早的版畫創作，也許可以更清楚看到他的人物畫風格的來源與變化，他在《方氏墨譜》裡就有不少的人物描寫，如果將《方氏墨譜》的〈墨精〉（圖13）與北京16750本的《養正圖解》之〈聽朝四輔〉（圖14；第5則，頁9a）加以比較，就可見到〈聽朝四輔〉中的持笏而立的成王與其他四位輔君之大臣，無論在臉型、體態、持笏的動作或是衣紋的處理上，都與墨譜中人物頗為接近。雖然北京16750本人物的衣袍更加的寬大，袖子的垂下處有微微的膨脹感，但是筆挺的衣袍紋路，交握的雙手處的衣紋表現都與《方氏墨譜》相仿。反觀，哥大蓋公堂本的〈聽朝四輔〉（圖15）人物的衣袍柔軟較無硬挺感，而是更加強調衣袖所製造出來的優美弧線，臉型及人物的神情也與《方氏墨譜》無甚關連。三圖對看之下，便可見到北京16750本風格較為接近丁雲鵬在《方氏墨譜》的繪稿風格。因此，也可以更為確定的說，北京16750本也就是吳懷讓刊本的《養正圖解》，應該才是原來丁雲鵬所設計繪稿的原本。

那麼哥大蓋公堂本，也就是玩虎軒本的《養正圖解》風格又是來自何處呢？如果與汪廷訥所編纂且於1600年左右出版的《人鏡陽秋》相比較，兩者風格上

似乎更為接近。以〈周舍〉（圖16；卷3，頁7b-8a）一圖為例，這個故事基本上就跟《養正圖解》裡的〈泣思直臣〉（圖17；第20則，頁39a）講的是同一故事：春秋時代的趙簡子有天在宴飲時，突然想起他已死去的臣子周舍，體認到忠臣不在，無人再對他直言相諫，不禁悲從中來的故事。《人鏡陽秋》的〈周舍〉（圖16）人物雖然臉型較圓而飽滿，而哥大本的〈泣思直臣〉（圖17）人物的臉型下巴比較尖細，但是兩圖的人物都是這種俊美的蛋形臉。同時，人物眼睛的描繪，通常也都像是在描繪有著一條細長尾巴的蝌蚪，起頭的黑點像蝌蚪身體的是眼球，從黑眼珠上端拉出一條於尾端微微向上揚起的線條，而形成輕微的丹鳳眼。這種眼睛的畫法，使得人物彷彿有些微微的眯著眼睛，再加上小而微向上彎的嘴型，使得兩圖的人物都好像眯著眼帶著笑意一般。這樣的人物臉型與表情的描繪方式，常見於徽派刻工所刊行的版畫中，或者可視為所謂的「徽派版畫」風格的特徵之一。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這種風格在十七世紀前後頗為風行，類似的風格並不只限於徽州的出版品，也有學者認為是跟隨著來自徽州的刻工而傳播到江南地區如杭州一帶。<sup>⑤①</sup>

如果以北京16750本的人物的臉型或是眼睛的描繪方式來對照（如圖8或圖10），就可以看到丁雲鵬的人物眼睛通常是以完整的畫出整個眼眶來表現，人物也不是近乎完美的鵝蛋或是圓形，也不像上述典型徽派風格人物一般，總是千篇一律的微笑表情。因而可知，雖然玩虎軒本看起來大體與吳懷讓本在風格與構圖上十分相近，但是仔細比對後，顯示吳懷讓本才是丁雲鵬最先繪製的圖稿，風格大致接近《方氏墨譜》，而玩虎軒本則可能是較晚才出版的典型徽派版畫人物的風格，與汪廷訥所主導的幾種版畫集子的風格相近，特別是與汪耕（fl. ca.17th上半）所繪圖的版畫風格更為接近，如《人鏡陽秋》插圖就是一例。<sup>⑤②</sup>

⑤① 學者其實也早已注意到有關徽派版畫的風格，早先的研究成果，詳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有關這樣的風格到底是如何形成，而之後又如何發展，筆者目前也尚無法有確切定論。更加確切的描述，當在大量的比對相關的版畫風格，方有可能實現，目前這個問題在鄭婷婷的論文已有不錯的闡述，詳見鄭婷婷，《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版畫研究》。本人也希望在日後能針對此問題，再進行更加詳盡的研究，目前只能根據所見到的這些版本進行觀察與歸納。

⑤② 有關《人鏡陽秋》的研究，詳見Li-chiang Lin, "Wang Tingna Unveiled—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95. Forthcoming.

學者對於繪稿者汪耕所知甚少，但是汪耕卻幫汪廷訥（ca.1550—after 1625）繪製過數種精美的版畫，如《人鏡陽秋》以及汪廷訥環翠堂所出版的戲曲版畫。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玩虎軒也出版過其他由汪耕所繪圖的戲曲版畫書籍，例如由汪耕繪圖、黃鏘與黃應岳所刻的《元本出相西廂記》插圖（圖18）。這個出自玩虎軒的西廂記插圖，相當的精美，而且人物的姿態與線條，都是徽派版畫常見的風格，例如圖中正在解鶯鶯衣帶的張生，身軀也是以較具弧度的輪廓線所構成，特別是長袍在膝蓋跪地的右腳上形成許多的平行圓弧，左大腿處也有數道圓弧線條以表現衣褶，整體的效果，就彷彿是張生的衣服內充脹著空氣，使得整個身軀有著微微的膨脹感。這種作法，與《人鏡陽秋》的〈周舍〉（圖16），以及哥大本《養正圖解》的〈善言格天〉（圖9）之插圖人物，都十分的接近。而更不用說張生的長相，鵝蛋臉再配上眯眯笑眼，以及帶著微笑的小巧嘴型，基本上就是典型徽州版畫的人物樣貌。

雖然目前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玩虎軒本的《養正圖解》插圖是汪耕所為，因為此本的繪稿者仍然說是丁雲鵬，但是從這些版畫的風格分析，加上汪耕本來就替玩虎軒創稿的狀況來看，玩虎軒本的《養正圖解》插圖是相當有可能是汪耕所繪，即便不是汪耕，也可能是學習汪耕風格的畫家所為。那麼為什麼不特別標出新的繪稿者呢？看來丁雲鵬作為繪稿者，顯然不容易被取代，不像刻工黃鏘，足以取代刻工黃奇，因此在玩虎軒本中，仍然說是丁雲鵬所繪稿，但刻工已是黃鏘。<sup>③</sup>然而前面的討論，也已經見到玩虎軒本插圖風格，與丁雲鵬慣常的繪稿風格並不全然相符，應該不真的是丁雲鵬的創作。綜合上面的比較得知，吳懷讓本應該才是丁雲鵬的首創之稿，而玩虎軒本則是根據吳懷讓本而來，卻是由汪耕或是與汪耕有關的畫家所創稿者。丁雲鵬所創出的稿樣也成為徽派版畫風格的一種，但是與汪耕相關的風格，可能才是更加流行，且慣常見到的徽派版畫風格。<sup>④</sup>

---

③ 相關的繪稿者與刻工的資料被紀錄在祝世祿的序言中，關於玩虎軒這部分的資料，詳見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5, fig. 8.

④ 有關徽派風格的其他案例詳見鄭婷婷，《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版畫研究》。

另外，玩虎軒本雖然是較晚的刊本，但是仍有頗高的藝術價值。譬如哥大本的〈振貸貧民〉（圖7），就與北京16750本（圖8）有較大的差異，哥大本中，原來跟在圖下右方手中持杖乞丐前面的小童，被改到持杖乞丐的右手邊，並且伸出手來跟立在糧倉邊的僕人拿取銅錢，這位僕人是哥大本才有的，原來的北京16750本並沒有特別畫出「發錢」的景況，只看到領了糧食的貧民同時在手肘上也扛了一串銅錢。哥大本基本上都具有北京16750本的細節，但是又在糧倉邊上添加一位發錢的僕人，以及讓跟隨乞丐的童子移到僕人跟前領取銅錢，甚至上方位於兩樹中間的僕人身上也背著兩串銅錢，以表示周文王不止發糧，也準備了錢財來賑濟貧民。玩虎軒本的畫家似乎想藉由增加「一組」發錢領錢的人物，更清楚的畫出災民領錢領糧接受賑濟的狀況，而的確也因為如此，哥大本此幅插圖也較北京16750本有了更豐富的細節，讓觀者可以在畫面上停留更久。

又譬如說哥大本的〈聽朝四輔〉（圖15）就幾乎完全改變了北京16750本（圖14）的構圖，把場景從宮殿的過道移到宮殿的內部，周成王也站在大屏風之前，原來在北京本五人都面朝前方（只有左上方的人微微轉向中間的成王），在哥大本卻成了周成王在中間，而諸位輔佐的大臣都朝向他，雖然成王背後站著的大臣位置與方向都有些奇怪，但基本上用意是讓諸位大臣包圍著成王，護衛著成王。在此，玩虎軒本的畫家似乎要強調出文本裡寫的：「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的部分，因為北京本似乎看不出成王在聽朝的模樣，玩虎軒本卻改動構圖讓成王似乎正在聽取大臣的建言，而四位大臣也都分站四方，扶持著他，單從文本來看，似乎更接近文字中所敘述的細節。

玩虎軒本奠基於吳懷讓本，但是又經過重新繪稿，甚至在仔細的研讀推敲文意之後，而特意的對畫面有所更動、加以增減。如果再仔細的比較，還可以看到其他種種所增添的細節，<sup>⑤</sup>似乎是玩虎軒本認為這樣的修改可以讓文本更清楚，或是敘事更合理。細究之，可以見出玩虎軒本想要與原來刊本一較高下的用意，特別是幾幅與吳懷讓本差異較大的圖繪，更可看出其中的企圖。那

<sup>⑤</sup> 其他增添的部分，Murray也有討論，詳見Julia K.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pp. 141-143.

麼吳懷讓本的敘事手法又有何特出之處呢？玩虎軒本的作法是否真的超越了前者？

#### 四、丁雲鵬的版畫創作與敘事技巧

如同《帝鑑圖說》，《養正圖解》也是以「圖先文後」的方式呈現，以插圖來吸引讀者的立意甚明。如果以敘事圖繪的構成來看，《帝鑑圖說》的製作早於《養正圖解》，當時的刻工與繪圖者以許多的圖像小單元來作各式各樣的重組，以便製成多達一百一十七幀的插圖，而這也是明代版畫插圖常運用「單元組構」的方式。這裡所謂的「單元組構」，基本上就是雷德侯所闡明的概念：在中國藝術或是工匠的傳統中，使用標準模件系統（module system），來做不同的組合，以便能進行大量製作。<sup>56</sup> 只是有些學者並不同意稱這些在畫面上可見的宮殿、大門、殿庭中的植栽，或是常常出現在畫面邊角上的雲、樹木或坡石為標準模件（module），因為這些物件未具有統一的高度、寬度等等的如此「標準化」的條件。<sup>57</sup> 因此，在此只稱上述的這些「物象」為個別的「單元」，而使用較為模糊的「單元組構」方式來說明畫家的作法。不過，基本上這確實是中國工匠相當聰明的作法，特別是在製作好皇帝的部分，因為往往都是發生在朝堂之上的事件，透過這些類似單元的變換組合，就可以讓畫面有所變化，提供故事所需許多類似卻又不盡相同的場景。相較之下，為了凸顯歷史上的眾多暴君，《帝鑑圖說》在圖繪壞皇帝行徑時，卻有較具創造力的製作，畫家似乎有更多的空間與自由，去表現歷史上種種匪夷所思的暴君罪行，使得壞皇帝的插圖，比起值得效法的聖君更具吸引力。也因為這樣，這些暴君的行徑，在傳到日本之後，甚至被轉化成一種中國古代帝王的享樂圖式，本來應當

---

<sup>56</sup> 詳見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57</sup> 在2004年本人發表帝鑑圖說的文章時，現場就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質疑，所說也相當有理。因此，為免造成誤會，在中文的語境中，我傾向選擇較為模糊的說法，但是基本上贊同雷德侯的觀點。參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 339, note. 51.

要避免的行為，在日本卻被認知為值得嚮往的異國君主遊樂生活之片段。<sup>58</sup>

不過，《養正圖解》書中所蒐羅都是值得模仿學習的榜樣，並沒有壞皇帝可以圖繪，負責《養正圖解》插圖的晚明畫家丁雲鵬，又是如何構思製作這六十幅的插圖呢？丁雲鵬較少使用「單元組構」式的構圖法，雖然某些構圖似乎仍有些重複，但卻可見到丁雲鵬試著為不同故事，製作個別插圖的苦心。就藝術的創作觀點而言，是更具原創性的作法，而較遠離作坊式的「單元組構」之製作。丁雲鵬加入版畫的繪圖製作，可說是晚明以著名畫家來擔任創稿者潮流的先驅。

事實上，丁雲鵬《養正圖解》的插圖，比起《帝鑑圖說》，背景更加的簡化，往往只是屏風或是桌椅所框圍出的宮殿一角，或是以湖石或欄杆所暗示的庭園中一隅，通常沒有太多複雜的背景，加上人物形貌特殊不以俊美取勝，以及衣袍以顧愷之的風格來呈現，因此整本書的插圖，散發出一種相當高古的氣氛。就以〈詢求政術〉（第21則，頁41a）為例（圖19），吳懷讓本圖中的背景似乎在庭園裡，前方主要的人物董安于正恭敬地請教蹇老有關治理國家之道，焦點都在兩人身上，就連庭園裡安排了兩棵樹，也恰如其份的暗示出兩人相遇的情誼，此種以群樹叢聚來象徵友情誼的作法，最有名的便是倪瓚（1301—1374）所畫的〈六君子圖〉，蘇州畫家如文徵明（1470—1559）與唐寅（1470—1524）也沿用過這樣的手法。因此，早年也學習過文派畫風的丁雲鵬，對此手法的運用定不陌生。而手持長杖的蹇老留著長鬚，大鼻凸額加上瘦削臉龐，顯得相貌奇特，丁雲鵬也使用了顧愷之風格來描繪他的衣著，衣裙下擺形成類似女史箴人物的圈紋，看上去更有一種不凡的氣息。整個故事發生的背景相當簡單，沒有太多的細節，庭園後方大樹旁有著奇特的壘石，上大下小橫直交錯層層堆疊，加上左方木框的矮榻，似乎都散發著高古的韻味，也呼應加強了老者不凡的氣質。這種特殊的處理方式，如果對照玩虎軒本裡同一則故事的插圖（圖20），更可以看到丁雲鵬的特意為之。雖然玩虎軒本的這張插圖也描繪得

<sup>58</sup> 有關《帝鑑圖說》圖像的製作，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p. 336-341. 有關《帝鑑圖說》傳到日本之後的變化，詳見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1990.2），頁11-31。

四平八穩，插圖把相貌平常的蹇老安置在草屋亭中，似乎為了更能顯示出董安于前往其住處拜訪之意，才做這樣的安排，但是將亭柱置於兩人之間，削減了兩人間的聯繫，且園中湖石也被這根柱子重疊貫穿一切為二，使得畫面有些紛亂，大大降低以嶽崎磊落的疊石來比喻隱者蹇老的用意。對照之下，在吳懷讓本中，丁雲鵬簡化畫面組成因子，使得焦點更加集中，觀者的注意力自然被兩位主角的互動所吸引，這種簡潔高古而焦點突出的表現法，使得插圖有著特殊引人的特質，更可看出丁雲鵬的苦心經營。

這種高古的氣氛，不僅僅是因為空間與背景的簡潔單純，丁雲鵬其實在畫中使用了許多的古器物，以便加強這種古代的氛圍。例如吳懷讓本的〈膳斥鮑魚〉（圖21；第2則，頁3a），畫面中的矮食案，與《方氏墨譜》中的〈青玉案〉（圖22）雖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形制同樣都是較為低矮，案腳的雕花也有些類同，丁雲鵬很可能是將他所繪製過的家具器物做了些微改動，再運用到他的人物故事插圖上來。因為故事的背景有許多發生在春秋時代，丁雲鵬也描繪了一些青銅古器來加強《養正圖解》畫面的古樸氣氛，例如在〈膳斥鮑魚〉中屏風後的高桌上，就陳列著幾件形制古老的青銅器，而姜太公身後的侍者也手捧青銅爵。多了這些古器物，《養正圖解》的插圖因而更增添古色古香的氣息。之前，丁雲鵬不只為《方氏墨譜》畫過一些青銅器，他也曾在1588年左右替重刊的《宣和博古圖》重新模寫描繪過這些古器物。因此，《養正圖解》插圖中的古器物其實相當多都是有所本，丁雲鵬之前創作過的版畫，應該都提供了他相當多的靈感，對於創作《養正圖解》當有不少的助益。

丁雲鵬為圖譜類書籍創製過的稿本，主要都著重在器物形制的描寫，或是強調器物上的圖案裝飾，而《養正圖解》可說是他的第一本有著眾多人物敘事畫的版畫創作，成為他可以盡情發揮的舞台。他不但將繪製過的版畫圖繪運用在《養正圖解》中，他似乎也將之前曾經模繪過的古畫融進他的插圖裡。在〈不賣的盧〉（第42則，頁83a）一圖（圖23），圖中的馬，鬃毛豎起，馬嘴大張，顯然是一匹難以馴服的馬。這匹馬的情狀卻與現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唐代韓幹（ca. 8th）的〈照夜白〉（圖24）圖中的駿馬十分相像，丁雲鵬或許曾摹過〈照夜白〉，因而在此用這個圖像來表現的盧凶馬。此種圖式的運用，的確相當適切地表現出凶馬的桀驁不遜。而對於較為熟悉古畫的讀者，這種古典

圖式的使用，也一定會令他們印象深刻，知道丁雲鵬其實是有所本而為，更突顯出他不是一般平常的畫師。

若以敘事技巧視之，丁雲鵬也有相當細膩的表現。如〈亟用賢人〉（第7則，頁13a）一則，描寫的是齊桓公勇於任用賢人的故事：甯戚前往會見桓公，桓公想要任用他，但是身旁的群臣頗有微詞，桓公卻能獨排眾議，決定任用之，而且急切之態溢於言表，進而「於是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丁雲鵬的這幅插圖（圖25），齊桓公獨立於屏風圍隔的御座前，神情肅穆，衣袖線條堅實有力，特別是從肩部而下的兩邊衣袖外側（圖27），線條簡潔而充滿力道，較右前方的兩位臣子之衣袖更為道勁方折，兩位大臣的肩線與衣袖線條都帶有較多的弧度，因而衣服顯得鬆軟甚或有微微飄動感。相形之下，桓公的兩隻衣袖有如磐石般穩定的交會於身前，以堅實而沈穩的形象來描畫齊桓公，似乎更能強調出他堅定的態度與獨排眾議的決心。

然而丁雲鵬敘事的細膩處，更可從比較玩虎軒本中顯現。本來就是重摹自丁雲鵬稿本的玩虎軒本插圖（圖26），乍看之下，與前者沒什麼太大的差異，但是如果仔細比較，卻頗有值得玩味之處。從人物的表情來說，在吳懷讓本中（圖27），雖然最右邊的臣子神情似乎有些木然，但是丁雲鵬卻將較為靠近桓公的大臣疑惑與質疑的眼神描繪得相當生動，該臣子的右眉挑高，望向他左邊的同僚，希望獲得比較積極的回應，生動地把該名官員不滿卻又不能明顯表現的幽微情狀突顯出來，恰恰與桓公堅定的神情成為對比。加上齊桓公堅定方折有力的衣紋，似乎更加強調出了他貫徹意志的決心。不過這樣的衣紋到了玩虎軒本（圖28），卻變成了與前方大臣類似的、柔軟而更強調韻律的線條，重摹者顯然較著重在表現線條優美的弧度，而沒有注意丁雲鵬以線描來表現人物個性與決心的用意。而且因為玩虎軒本慣常以一種眯眼微笑的方式來圖繪人物，使得無論是長相俊美表情嘻笑的桓公，或是前方兩位也帶著笑意的臣子（當中一位眼神似乎還望向畫外，並未跟旁人有所交集），都欠缺人物深層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

不僅如此，丁雲鵬甚至試圖去描繪出桓公用人心切的態度，前方手捧大臣衣冠的侍者，從衣裙下擺的紋路與裙下露出一前一後的左右雙足判斷，丁雲鵬將侍者圖繪成快步行進的樣貌，似乎是因著桓公的催促而忙著加緊辦理授爵

儀式(圖25)。這種近乎小跑步的姿勢，在玩虎軒本卻成了侍者靜立於甯戚前方，要把冠帶交給甯戚的場景(圖26)。或許可以說兩者選擇描繪的時間點有所不同，但是更有可能的是重摹者並不能領略丁雲鵬的「創意」。因為丁雲鵬特別選擇描繪侍者小跑步的姿態，更能表現出桓公「亟用賢人」的急切，故事裡桓公甚至等不到隔天才為甯戚封爵，而必須即刻的「夜舉火而爵之」。屏風前燃著巨大燭台，固然已經可以點出桓公在夜晚授爵的情狀，但是侍者被催促以致於須小跑步的進場，似乎更能細膩表現文意。僅僅憑藉此細微的描寫，丁雲鵬卻巧妙的凸顯了桓公的心急，而將「亟」用之意，傳達得淋漓盡致。

這種作法令人聯想起北宋末年，朝廷以詩畫取士的例子。在畫史中記載，徽宗畫院取士，要眾畫工畫出詩句的意涵，而奪魁者，是要能精微傳達詩句中最難表現的部分。譬如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要求畫工圖繪出「亂山藏古寺」之意，當中最難圖繪者，便是「藏」字，拔得頭籌的畫家，畫出一片荒山當中，只露出佛寺的幡竿，但是並未再畫出佛寺建築的任何部分，進而強調出「藏」字之意。<sup>⑤⑨</sup>雖然現存的北宋畫中似乎沒有實例可證，不過南宋畫裡，卻有類似的例子。如現藏於日本根津博物館的馬麟〈夕陽山水〉圖(圖29)，乍看之下，只有些許的圖像，簡單的遠山，將天邊雲彩染成一抹暈紅的夕陽，前景的幾隻燕子，還有不細察幾乎會錯過的水紋，就構成了一張非常詩情畫意的南宋冊頁。<sup>⑥⑩</sup>然而，再仔細的觀看，就發現更有趣的現象，這些燕子根據詩意，應該要努力飛回巢中，因為夕陽已西沈，回家將遲。乍看之下似乎正在橫渡水面的燕子，其實正三三兩兩的在水面上嬉鬧，可以看到中間靠左的那隻正準備要往下俯衝，其他的也都各有姿態，玩得興致正濃。馬麟為了表現「燕渡夕陽遲」詩句中，最難傳達的「遲」字，將燕子做了這樣的安排，由於貪玩，所以即使天色將暗，群燕還在水上嬉鬧，因此，歸巢的時刻，勢必「遲」了。就是以這樣細膩的描寫，南宋院畫家馬麟示範了，北宋徽宗畫院以來，強調以繪畫

<sup>⑤⑨</sup> 相關文獻詳見陳高華編，《宋遼金畫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611。

<sup>⑥⑩</sup> 本畫詳細的研究，詳見板倉聖哲，〈馬麟『夕陽山水圖』の成立と変容〉，《美術史論叢》，第20期(2004)，頁1-31；另見板倉聖哲編，《南宋絵画—才情雅致の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頁150-151。板倉教授在文中相當詳盡的討論了詩句的由來以及此畫所承載的花鳥畫傳統。

精微而別出心裁地詮釋詩句的作法。<sup>⑥1</sup>

從丁雲鵬的〈亟用賢人〉一圖的表現來看，他顯然也熟悉宋代畫院這種以詩「求」畫，以畫「釋」詩的要求，即便不見得真的看過這些畫，在印刷發達的明代，應該也相當容易透過畫史的記載，瞭解到徽宗畫院曾有過的成就。因此，也才會在他的《養正圖解》中如此費盡心思的去表現最難以表現的「亟」字。令人不禁懷疑丁雲鵬是否特意以這樣的方式來上追古人？上述這些圖繪的設計與圖文敘事的特點，都可以看出丁雲鵬表現敘事圖繪的細膩之處，並且也充分展現他自身的才學，<sup>⑥2</sup>無怪乎此書一出，南京的市場會「珍為奇貨」。

## 五、《養正圖解》的規鑒意涵

雖然丁雲鵬繪圖是《養正圖解》的一大賣點，但是此書作為皇家的講讀教材，又有怎樣特殊的編排呢？又收錄了那些內容呢？此書第一則〈寢門視膳〉，便是周文王（1152—1056 BCE）的世子如何孝敬其父王的故事，作為一本給皇子講讀用的教科書，孝順排在第一則，確實是頗為恰當。接下來的第二則〈膳斥鮑魚〉，講的卻是周武王（？—1043 BCE）的老師姜太公（fl. ca. 12th—11th BCE），因為鮑魚上不得廟堂祭祀，因此認為不適合太子食用，以表達應該要用相當謹慎莊重的態度來教養太子。最前面的兩則故事，一是要太子知道該如何的孝順父王，一則是教導皇室要如何的善養太子。因此，此書不單只是要給皇子講讀之用，基本上所講的孝順與皇子的教養，都還是屬於太子當為，以及太子應當被對待的方式。所以，雖說是給皇長子的講讀書，但是書一開頭，焦竑便很清楚的在教導皇子應該如何學習「太子」之道，無怪乎此書一出，其他的講官會如此的氣急敗壞。

更重要的是，若霍韜與鄒守益真的是以獻書太子來諷諫當朝皇帝，那麼焦

⑥1 這樣的解釋來自本人教書過程中的體會，有關中國歷來詩與畫的互讀與轉譯，似乎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板倉教授在文章中也注意到燕子在水上的各種不同姿態，但並未進一步藉此討論詩畫關係。板倉聖哲，〈馬麟『夕陽山水圖』の成立と変容〉，頁3。

⑥2 有關丁雲鵬的學養，詳見Sewall Jerome Oertling II, "Ting Yun-P'eng: A Chinese Artis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h. D. dissert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1980).

竝此書難道沒有這樣的含意嗎？從《養正圖解》的第一則故事「寢門視膳」，就與霍、鄒二臣所進之《聖功圖》的前兩圖「文王世子問安」、「文王世子視膳」意涵相同來看，便可知道焦竝的確是參考了二人所進的圖冊，<sup>⑥③</sup>更清楚的當然是他自己也在疏文提及此二人獻書之事。<sup>⑥④</sup>《聖功圖》借用了作為太子講讀書籍之名，卻行規鑒嘉靖皇帝之實，那麼熟知此狀況的焦竝，在他所編的《養正圖解》書中，是否同樣隱含著要對萬曆有所勸誡的內容呢？

細看焦竝所安排的內容，前述的第一、二則〈寢門視膳〉與〈膳斥鮑魚〉故事，緊扣著「子孝於親」與「善養太子」的君臣父子之道，緊接著第三則〈振貸貧民〉（第3則，頁5a）便是教導帝王要能體恤生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sup>⑥⑤</sup>

故事中，周文王問姜太公為天下之道，姜太公的回答是應該要富百姓，而非只富於士與大夫階級。在接下來的解釋中，他特別強調：「夫財貨欲其行如流水，故謂之泉布，若專務積之而不散，是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蓋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不在官不在民，則必在勢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則治，在上則亂。而其原必在人主清心寡欲，則用度自然不多，取民自然有節，由此天下化之…」<sup>⑥⑥</sup>此處很清楚的說必須要人主能「清心寡欲」，才能「取民有節」。值得注意的是，焦竝對於錢財流通有著相當一致的看法，李劍雄就指出焦竝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論述，特別強調「錢者泉也」的說法，<sup>⑥⑦</sup>從此點也可看出《養正圖解》的文本解釋，確實出於焦竝之手。雖然也

---

⑥③ 有關《聖功圖》的內容，詳見附錄一。此附錄是根據霍韜的〈東宮聖學疏〉而來，此文收於孫承澤之《春明夢餘錄》，卷33，頁8a-10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⑥④ 焦竝，〈養正圖解題奏〉，《養正圖解》（清代重刊本），頁1a。

⑥⑤ 焦竝，〈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b。

⑥⑥ 焦竝，〈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b-6a。

⑥⑦ 詳見李劍雄，〈焦竝的生平、思想與著作〉，收於焦竝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頁14。

有人懷疑主要文本後面接續的解釋是否為焦竑所為，通常正文會取自古代文獻，而正文之後的解釋往往才是編者加以引伸，闡述道理，用以規勸帝王最重要的部分。

而且，這樣的訓誡根本就是針對萬曆而來，焦竑的真正用意，並不是只要教導在當時連皇太子都還不是的皇長子而已，而是為了規勸真正掌握權力的萬曆皇帝。因為這樣的論點其實也出現在他直接規勸萬曆的議事中，在〈國計議〉中，他就明白的勸誡皇帝：

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即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涓涓不塞，將為江河。…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即選桑孔之儔授之握算，無能為籌矣。<sup>⑥8</sup>

焦竑明白的指出萬曆只顧自己的花費，四處聚斂，而沒有顧到百姓的甘苦。況且當時國家天災頻仍，皇帝卻不節省開支，因而他才會在結論中說，即使是最善理財的人，也無法支應這樣的狀況。這番出現於正式的章奏中的苦口婆心，就與上述《養正圖解》中的諄諄訓勉如出一轍，顯然焦竑對於萬曆的奢侈斂聚，有所不滿。《養正圖解》說是皇子的教科書，但是卻直指皇帝的弊病。

焦竑不但希望萬曆節儉，也希望皇帝可以遵循舊法，而能有所作為。例如在〈遵守舊章〉（第56則，111a-112b）一則中，他講解完宋代前後兩位賢相如何的遵守祖宗成法之後，接著話鋒一轉，進而闡述並批評當時狀況：

近日祖制漸湮，脩明振舉全無其人，只是無益之言，連篇累牘。朝進一說而暮即更之；暮進一說而朝又更之。言者不必可行，行者不必有實。吏民奔走紛紜，無時休息。致使詔旨不信，人生玩忽，其為治道之害，豈小小哉？<sup>⑥9</sup>

<sup>⑥8</sup> 焦竑，〈國計議〉，收於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卷5，頁28。

<sup>⑥9</sup> 焦竑，〈遵守舊章〉，《養正圖解》，第56則，頁112a。

焦竑顯然對於當時朝廷不能遵守祖制頗有不滿，認為朝中大臣只會長篇大論盡說些無用之言，真正做事來振作朝政的卻無其人，而且也常常朝令夕改，人民無所適從，政府的威信也蕩然無存。這些弊端，他都在《養正圖解》書中清楚指出，並且也明白表達對於時政的不滿。

除了指出時政的弊端，焦竑也在多處暗示作為皇帝應該要勤政、節慾，應該要能與臣民上下交通。當然書中也有多則強調要尊師重道、任賢圖治的故事，<sup>⑦⑩</sup>這也是之前張居正在《帝鑑圖說》中所特別要強調的。<sup>⑦⑪</sup>不過，在《養正圖解》中卻出現一則較為特別的故事，就是〈夫婦如賓〉（第11則，頁21a-22b），故事是晉文公（671—628 BCE）的使臣白季（fl. ca. 7th BCE）遇見冀缺（fl. ca. 7th BCE）在田中工作，其妻將食物送至田間給冀缺，兩人間互動非常的恭敬，有如賓客一般，白季將此情形報告晉文公並說「敬是德所會聚，人能敬，則眾德皆歸」，因而將冀缺推薦給晉文公。<sup>⑦⑫</sup>雖然故事乍看還是強調推舉有德之人的重要，但是在正文之後的解釋卻有下述的說法：

大抵夫婦之間，易為褻玩。況人主深宮之中，左衛袖而右嬖施，甘言遜色，爭妍取憐，卒至昵能消正，義不勝恩。男牽於欲，而失其剛，女狎於愛，而忘其順。沈溺浸深，忍情難決，敝有不可勝言者，孰若以禮隄（提）防之，令寵嬖不犯，而宮闈常肅之為美也哉。觀者即冀缺之事，亦可以得師也。<sup>⑦⑬</sup>

故事的重點從本文的「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sup>⑦⑭</sup>突然轉到談論起皇帝後宮的狀況，提到人主因為寵幸愛妾，以致產生弊端，恐怕焦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這個部分，要人主以禮來防止後宮嬪妃的「恃寵而驕」，

---

<sup>⑦⑩</sup> 關於《養正圖解》書中故事的意涵，參見附錄三。

<sup>⑦⑪</sup> 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pp. 330-333. 張居正當然有其用意，當中最重要便是灌輸萬曆，天下可一人主之，但無法一人治之，應當要任用賢能，並且信任所任用的大臣，這樣國家才能大治。

<sup>⑦⑫</sup> 焦竑，〈夫婦如賓〉，《養正圖解》，第11則，頁21a-22b。

<sup>⑦⑬</sup> 焦竑，〈夫婦如賓〉，《養正圖解》，第11則，頁22a-b。

<sup>⑦⑭</sup> 焦竑，〈夫婦如賓〉，《養正圖解》，第11則，頁21b。

似乎暗指萬曆不可因為寵幸鄭貴妃而犯下錯誤。<sup>⑦⑤</sup>

焦竑的這些規鑒，無論是暗示或是明指，應該都是不太討喜的。特別他直接指出萬曆奢侈浪費、需索無度，以及明白指出若過於寵幸嬪妃即可能產生弊端，都是萬曆最為人所詬病者。在《明史》焦竑傳中就提到說：「竑既負重名，性復疎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sup>⑦⑥</sup>不只是焦竑的同僚想要將他除之為後快，萬曆皇帝應該也不希望焦竑常常來規鑒他吧。也因如此，焦竑才會因為他人的「誣告」，而被降職外調。名為皇子教科書的《養正圖解》，卻暗含許多規鑒萬曆皇帝的建言，甚且可能隱含著皇帝接受皇長子為太子的意涵，焦竑的立意雖佳，然而比起《帝鑑圖說》受到的重視與產生的作用，焦竑也只能感慨「時不我予」。

## 六、追摹前賢

《養正圖解》的最後一則〈借事納忠〉（第60則，頁119a-120a）講的是宋朝王曾（977—1038）在天聖年間（1023—1032）錄先賢事著書以獻之事：

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摹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sup>⑦⑦</sup>

雖然講的是宋朝大臣王曾的故事，但主角也編有一本附圖的「古先聖賢事蹟」書籍，且與焦竑的《養正圖解》同樣有六十則，這當中的類同，當然是焦竑有意為之。焦竑以宋代王曾繪圖以獻的事例作結，且置於其書的最後，明顯以宋人自況。在文後他更加以闡釋說道：「觀曾酌古準時，攤詞命筆，唯恐言語之不能感通，世道之不如堯舜。一段苦心尤有楮墨不能窮，丹青不能肖者

<sup>⑦⑤</sup> 有關兩人的情感以及鄭貴妃對萬曆的影響，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頁36-38、41-42、89-90、107-109。

<sup>⑦⑥</sup> 張廷玉等著，〈焦竑傳〉，《明史》v.24，卷288，列傳第176，文苑4，頁7393。此傳亦收於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下，頁1231。

<sup>⑦⑦</sup> 焦竑，〈借事納忠〉，《養正圖解》，第60則，頁119b。

。嗚呼志士懷忠，古今一揆……」<sup>78</sup> 他的「志士懷忠，古今一揆」真是說得再清楚也不過了，如此彷彿將自己化身為古人，明白清楚的以古人自況，確實是相當特別的作法，如此的自我標榜，難怪要遭到同事的排斥。

其實以古人自況，或是以講讀書籍來勸誡皇上，甚而影響或指導皇帝的施政，距離焦竑最近的典範，正是張居正編纂《帝鑑圖說》教育萬曆一事，詳究《養正圖解》的內容，也可發現焦竑其實深受張居正此位前輩的影響。最明顯可見的便是兩人都認為皇帝或是皇子尚年幼，需要特別的教導，因此編纂歷史故實書籍，實為啟發聖心的重要手段。其次，焦竑《養正圖解》的編纂體例也與《帝鑑圖說》十分相近，都是插圖在先，繼而引用前人文獻，再於其後以淺白的話語對於文本詳加解釋，雖說是為了教育皇子而闡述文理，但是這個部分，往往便是兩人藉題發揮之處，或是抒發個人感懷，表明個人立場或心志，或是對於時事有所議論，或對當今皇帝加以勸誡。因而，仔細閱讀之，往往可以發現弦外之音。

以《養正圖解》的〈開館親賢〉（第46則，頁91a-92b）為例，此則故事也收在《帝鑑圖說》中，但被稱為〈弘文開館〉（1-38則，頁761-2），<sup>79</sup> 講的都是唐太宗（r.627-649）在弘文殿聚集二十餘萬卷書冊，並且延攬知名學者輪值講讀，孜孜不倦的事例，兩則正文幾乎如出一轍，只有少數幾字的增減異同：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sup>80</sup>

張居正在《帝鑑圖說》正文後的解釋，較為強調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但是卻能好文勤學，因為太宗知道「戡亂用武，致治以文」（頁762）。相較於前者的簡要敘述，焦竑先就故事本身進行解說，接著借用宋代人臣對皇帝的建言，

---

<sup>78</sup> 焦竑，〈借事納忠〉，《養正圖解》，第60則，頁120a。

<sup>79</sup> 《帝鑑圖說》一書的編排，基本上將歷史上的統治者分成善惡兩部分，在此為了便於說明，以及讀者容易尋找，將善的部分視為第1部分，惡則為第2部分，因此如果是書中好皇帝的部分第三十八則故事，則標示為1-38，因為原書並無此種標示，特此說明。

<sup>80</sup> 焦竑，〈開館親賢〉，《養正圖解》，第46則，頁91b。

帶出他所要強調的長篇大論：

昔李淑為侍讀，言於仁宗曰：「觀唐室召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此言甚得設官講讀之意…然則稍法唐人之所為，夜引儒臣，分番直宿。或以日間已講讀而意所未諭者，再使詳解細說，或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明白啟導。或萬機之暇，有疑貳不決者，就事諮詢，使之開陳獻納，因以明習國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漸，似亦治世之所當急也。<sup>⑧1</sup>

焦竑特別強調設置講官的用意，並不只在講解經書，更重要的還在於使君臣得以時時親近，能從經書內容之講解，引伸至當朝的時務裁決與政事施行。其實，這樣的理想早已在萬曆登基後的前四、五年間就被張居正施行過。當他講解《帝鑑圖說》時，往往便會將其引至現實的政治情狀，進而對萬曆有所建言。明代史官顯然也明瞭此中真意，因此，張居正講讀《帝鑑圖說》之事，就曾數次被記錄於史冊之中。<sup>⑧2</sup> 譬如張居正講解漢文帝（r.180—157 BCE）〈屈尊勞將〉之故事，就將其延伸到應該給予當朝武將較多的權力，以便武將在外可以便宜行事。<sup>⑧3</sup>

更特別的是，張居正也利用了這些圖繪，來指導萬曆如何在朝堂之上「表演」的像個好皇帝。萬曆二年（1574），張居正要求萬曆要召見並褒揚傑出的地方官，其實在他舉行這樣的典禮之前，張居正才剛剛講過《帝鑑圖說》裡的〈褒獎守令〉（頁746）與〈召試縣令〉（頁782）的故事。前者是有關漢宣帝（r.74—49 BCE）的故事，宣帝認為地方官與民眾最為貼近，因此特別重視地方官的任命與獎賞。在張居正的輔導之下，登基才第二年的萬曆便舉行了召見地方官的典禮。剛剛才講過的故事，萬曆就有機會可以模仿施行，也許在萬曆

⑧1 焦竑，〈開館親賢〉，《養正圖解》，第46則，頁91b-92b。

⑧2 相關的講讀實況被記錄於起居注或是實錄中，詳見陳生璽、賈乃謙，《帝鑑圖說評注》（鄭州：鄭州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1-13；本人的《帝鑑圖說》研究，又從其他文獻中找出張居正講讀此書內容的記載，進而將其製為文後之附錄，詳見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p. 321-359. 特別是附錄B。

⑧3 陳生璽、賈乃謙，《帝鑑圖說評注》，頁1-13。

行禮如儀時，心中也會浮現出《帝鑒圖說》書中〈褒獎守令〉故事的畫面。再加上圖裡的衣冠，也都是明代的形制來看，張居正要萬曆感覺到，《帝鑒圖說》中的故事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可以被實現的未來。如此一來，《帝鑒圖說》不但是一種行為的指導手冊，更是一種被視覺化了的劇本，足以輔助幼小的皇帝在政治的殿堂上，適切的扮演他的角色。<sup>84</sup>

不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養正圖解》中有四則有關唐太宗的故事，在只有六十則故事的書中，不可謂不多，然而卻沒有任何魏徵（580—643）規鑒太宗的故事。相較於《帝鑒圖說》在一百一十七則故事中，收錄了十三則的唐太宗故事，當中有五則都是太宗與魏徵君臣互動的紀錄，《養正圖解》顯然是特意避開了魏徵。為什麼焦竑不收錄中國歷史上最能代表「君聖臣賢」的組合？特別是在一本相當強調為君之道的皇子教科書，反而未被收錄呢？

另外一件事也可看出《帝鑒圖說》的講授，所產生的影響。就在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要回鄉處理父喪時，出發前萬曆賜給他一枚銀印記，要他在返鄉時，可以用此印記，封書上奏。印記上的文字是「帝賚忠良」，據張居正自己的解釋，帝賚指的是殷高宗的〈夢賚良弼〉，故事是商高宗因求才深切，上天托夢啟之，稍後商高宗將夢中所見之賢臣之肖像繪出，使人四出求賢，終於獲得良相；而「忠良」說的是魏徵對唐太宗的忠直。<sup>85</sup> 在《帝鑒圖說》一書中，八十一件好皇帝的事蹟裡，唐太宗就佔了十三件，與魏徵相關的就有五件，可見得張居正對唐太宗與魏徵君臣相處之道，十分推崇。從萬曆送給張居正的這枚印記中顯示，萬曆還特別將張居正比做上帝所賜的賢臣傳說，以及以忠心直諫聞名的魏徵。兩個典故都被收錄於張居正所編的《帝鑒圖說》中，萬曆在此時又將這些典故應用回賜給張居正，一方面見到萬曆對其之倚賴，一方面也充分顯示此書對萬曆影響之深。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因著對於張居正的厭惡，萬曆也憎惡起深為張居正推崇的太宗魏徵君臣，後來萬曆與臣下辯論兩人

---

<sup>84</sup> 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p. 343-344.

<sup>85</sup> 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p. 335-336.

的功過，最後甚至下令停止《貞觀政要》的講讀。<sup>⑧</sup>

焦竑當然知道萬曆對張居正的反感，因此即使收有四則的唐太宗故事，卻連一個也沒提到魏徵，這樣的安排或者就是不想惹惱萬曆。即便焦竑有他的謹慎，萬曆再度面對一本說是教育元子之書，但是隱藏著對當今聖上的建言與批評，應該已經感到相當厭倦了吧。焦竑的《養正圖解》並沒能像《帝鑒圖說》一般受到皇帝的重視，反而是招來了同為講官的其他官員之排斥。在當代如沈德符的眼中，不能不說頗有些咎由自取，因而有這樣的評論：「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抑承襲為之也。」<sup>⑨</sup>前二事指的是之前上《聖功圖》者的事例，對焦竑而言，當是企望《養正圖解》能有《帝鑒圖說》曾經發揮過的功能，承襲的應該也是張居正的企圖吧。

## 七、結語

成於萬曆二十二年的《養正圖解》，終於在萬曆二十五年時進到宮中呈給了萬曆。可惜的是，三十多歲的萬曆在張居正死後（1582）已經親自掌政了十五年，早已不是當年十歲登基，諸事不明的小皇帝了，對於焦竑的獻書，他只淡淡的說道，皇長子身體羸弱，不堪長時間的閱讀，此書待日後再作為教本。<sup>⑩</sup>既不說不接受，也不說馬上就要納為皇子講讀之用，而是敷衍以對，仍然未對是否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之事表態。同時也對《養正圖解》中隱含的諷諫時政之意，喬裝不知。早年張居正對萬曆所施行的教育，早使得萬曆對於古今歷史瞭若指掌。此時再度看到類似的獻書，即使萬曆可能讀出焦竑的用意，他也以一種漫不在意、輕忽的態度回應了去。雖然萬曆似乎並不重視此書，《養正圖解》卻在入清之後，為清代的帝王所研讀，乾隆（r.1736—1795）、嘉慶（r.1796—1820）均為此書做有詩贊或評論故事的內容，且到了光緒年間又被重新印製。甚至早就傳到朝鮮，又再度被翻刻刊行，<sup>⑪</sup>由此可見其作為規鑒圖籍

<sup>⑧</sup> 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p. 346.

<sup>⑨</sup> 沈德符，〈宗藩/聖功圖〉，《萬曆野獲編》v.1，卷4，頁102-103。

<sup>⑩</sup> 《養正圖解》光緒21年重刊本，序後所附萬曆之裁示。

<sup>⑪</sup> 詳見附錄二。

的重要性。

同時，丁雲鵬在《養正圖解》版畫的繪稿上，也有相當精采的表現，甚至將重要的人物畫如顧愷之的風格加以精簡，完成一種具有「高古」氣息的敘事人物畫風格，下開其他晚明畫家如陳洪綬等人更加奇特的人物風格表現。而他根據書中含意所畫出的版畫圖稿，也可見到丁雲鵬特意的設計，充分展現了丁雲鵬在敘事圖繪的精闢作法，以古人為本，甚至與古人爭勝的企圖。應該是較為晚出的玩虎軒刊本則展現另一種可能，因為有吳懷讓本在前，玩虎軒本除了大部分的圖繪抄自前者之外，似乎有意要更加亦步亦趨的跟隨文本，其敘事圖繪增添了許多的細節，細查之，增添的部分似乎均有所本，或者是構思圖稿者認為更為合理的畫法。玩虎軒本顯示了晚明時期，即便不是知名的畫家也能跟隨蘇州等地區知名畫家像仇英（fl.16th上半）與唐寅（1470—1523）的腳步，構思出穩當甚至出色的敘事圖繪，雖然相較之下，丁雲鵬的手法仍然略高一籌。

若就風格而言，透過吳懷讓本與蓋公堂本（玩虎軒本）的比較，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徽州地區，所謂的徽派版畫風格，其實至少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來自丁雲鵬的人物風格，在早期的時候，較為溫潤平和，如同在《方氏墨譜》中可見的勻整而粗細較為一致的線條，並不強調太多的動感。而從《方氏墨譜》到《養正圖解》，丁雲鵬有了更多的表現空間，人物的造型與表情也開始趨向較具個性的表現。到了玩虎軒本，漂亮的鵝蛋臉形，總是帶著微笑的表情，強調衣紋重複與圓弧韻律感的表現，再加上背景華麗與繁複的裝飾，就構成另一種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左右時頗為風行之徽派版畫風格。本文礙於篇幅與目前研究的現狀，雖然仍無法對於所謂的「徽派版畫」風格，進行全面的討論，但是從兩本不同的《養正圖解》也似乎可以見到此時版畫發展的不同面向，作為未來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最後，透過本文，清楚顯示原本要做為教科書籍的《養正圖解》，不但是刊刻精美的版畫書，更是圖文敘事精微細膩的藝術作品。而焦竑原來想要勸誡萬曆的意圖，雖然無法達成，但是他卻創出繼《帝鑑圖說》之後，另一本精彩且足以傳之久遠的書籍。二者一前一後均成書於萬曆年間，可藉以觀察由萬曆初年到萬曆中期版畫發展的某些面向，同時也能為同類型的規鑑類繪畫提供另一可資參考的架構，使吾人對於規鑑類的版畫或繪畫，甚至是晚明發展相當成熟的敘事畫，在中國晚期藝術史中之發展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附錄：

附錄一 嘉靖年間之聖功圖內容

此附錄是根據霍韜的〈東宮聖學疏〉而來，收於孫承澤之《春明夢餘錄》，卷33，頁8a-10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圖	內容	同樣或類似故事收於《養正圖解》者
1	文王世子問安	寢門視膳（第1則）
2	文王世子視膳（以上二者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	
3	文王世子齒讓，願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	
4	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	崇師問道（第48則）
5	神堯茅茨土階，願皇太子知我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	
6	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敦倫重儉也	
7	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皇太子知聖主嗇身勤民也	
8	周王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	
9	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	
10	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乃萬世太平之丕基也	
11	西苑耕稼，願皇太子知我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虞舜也	觀穫進規（第43則）
12	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我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關雎麟趾之風也	
13	商家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	

附錄二 《養正圖解》版本組別

基本上每一大組，代表的就是同一組板片，即使被修改過部分的內容，仍然被歸於此組，但以數字編號加以區分當中的變動。另外，曹鈞刊本雖然是修改自玩虎軒本，但是時間已至清代，為了區分與說明的方便，還是將兩者分成兩組。

組別	編號	藏地/現代重刊本	時間/版本概況
A	A1	上海博物館	萬曆二十二年（1594）吳懷讓刊本；明吳繼序書解，丁雲鵬繪圖，黃奇刻，不分卷，版框約24x16公分；A5基本上與A組其他版本均為同一組板片所印，但應是較晚印製的版本，因多加了焦竑1597年之「恭進圖解以仰禪諭教事」一文，以及增添了目錄頁，目錄版心刊有「戴惟孝刊」。 <sup>90</sup>
	A2	日本國會圖書館	
	A3	中國國家圖書館 索書號16750/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A4	中國國家圖書館 索書號04314	
	A5	國家圖書館（臺北） 索書號05656	

<sup>90</sup> 據許建崑的研究，焦竑的《澹園集》的出版似乎也與戴惟孝有關。在他的文章中寫著：「《澹園集》四十九卷萬曆三十四年內黃黃吉士雲蛟刊本。前有黃州耿定力、延州吳夢暘，以及門生陳懿典、臧爾勸四序。另有有許吳儒識語，言：『直指黃雲蛟公欲刊布之…屬謝和州嵩摠校入梓，而何州端台龍含山為光、王學博中起參校督刻，皆有勞焉。』」版心有「欣賞齋」、「戴惟孝刻」字樣。臺北偉文圖書公司民國六十六年影印（註21）…」同時他認為：「有關《澹園集》版本。李焯然考，中央圖書館藏萬曆間黃雲蛟四十九卷本，臺灣大學藏萬曆間欣賞齋四十二卷刊本，臺灣偉文據後本影印。從偉文影本看，兩本應為同本。何以有「四十二卷」之異，可能是筆誤，或者藏書目錄登載錯誤。」詳見許建崑，〈焦竑文教事業考述〉，《東海學報》，34卷（1993），頁79-98。許建崑也把此文登在上其網站，見氏著，〈焦竑評傳〉（一）、（二）、（三）（登於2005/5/27，於2012/8/16查閱：[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3](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3)、[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7](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7)、[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9](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9)）。有關《澹園集》的出版的討論亦可見於李劍雄，〈點校說明〉，收於焦竑撰，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頁1。對於欣賞齋本的《澹園集》之所出，上述學者均無具體的結論，但據目前可知之資料，《澹園集》首刊於1606年，焦竑所進的〈恭進圖解以仰禪諭教疏〉也在其中，因此相當有可能是在《澹園集》出版之後，此文才以〈翰林院修撰臣焦竑題為恭進圖解以仰禪諭教事〉為題刻入原有的《養正圖解》版本中，若此推論無誤，則此版新的部分，可能遲至1606年才被加入。

B	B1	國家圖書館（臺北） 索書號05654	萬曆二十二年（1594）翻刻吳懷讓刊本不分卷；此組與組A並非同一版，不過非常的相像，是相當忠實的翻刻本，品質頗佳，但整體而言仍不如組A精美。Murry指出B2本因為有偽託張居正進獻之詞，當為更晚所印製者。 <sup>⑨</sup>
	B2	國家圖書館（臺北） 索書號05655	
	B3	中國國家圖書館 索書號A01273	
C	C1	鄭振鐸曾收有殘本，目前藏地不明	萬曆二十五年（1597）玩虎軒重刻本；黃鱗刻/有1597年汪雲鵬之「養正圖解疏」
	C2	British Museum	
D	D1	中國國家圖書館 索書號15758	曹鈞重刊本（據鄭振鐸研究，此本實為據玩虎軒之板片修改重印者）， <sup>⑩</sup> 經本研究比較曹本與玩虎軒本也證實此點。封面底題有「曹癭庵重訂 蓋公堂藏版」；框約21.5 x 15公分，10行21字，白口，四周單邊，單白魚尾，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原下鐫「玩虎軒」（被剝）。書分為上、下兩卷，1669年重刊。為了區別還是將清代的曹鈞刊本，另分一組。
	D2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索書號 RAREBOOK 1685 2303	
E		現代重刊本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本以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	宛委別藏本，收有焦竑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恭進獻圖解疏，並聖旨批語。後亦收有明史焦竑列傳/此本的圖繪應當為依據玩虎軒本所抄繪者。
F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北）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清殿版畫匯刊》14（北京：學苑，1998）	武英殿刊本；從清內府所藏寫本重刊，自圖繪判斷，所謂的寫本根據的應當是吳懷讓刊本（組A），或是翻刻吳懷讓本（組B）而來。
G		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 索書號1823	朝鮮翻刻本，有趣的是雖然書名仍為《養正圖解》，但是全書並無任何附圖，刊者不詳，有1749年之跋，上下單邊，左右雙邊，框24.3×16.3cm，9行16字，注雙行。

<sup>⑨</sup> 見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pp. 100-105, note. 37;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p. 148. 不過Murray並沒有比較出此本與臺北05656本並非同一組板片所印。有關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這三個版本的比較，也可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1（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頁101。書志指出臺北05654本與05655本為同一組板片所印，與臺北05656本有所不同：「此本（05656）與前二書（05654, 05655）似為同一版刻，而繪圖線條較深，也較為清楚；唯若細加比對，其內文字畫、神韻偶有差異，不知係同一版刻加以修版，亦（抑）或係覆刻者。」（頁101）。本人的調查中也發現板片之不同，但是05654本與05655本的品質不如臺北05656本，詳加比較下，可看出是翻刻本，因而將此二本編入組B。

<sup>⑩</sup> 鄭振鐸，《劫中得書續記》，頁374-375。

附錄三：

養正圖解插圖內容（以下所據者為吳懷讓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16750本）

順序	標題	頁碼	主角	內容簡述
1	寢門視膳	1a-2b	周文王	太子之孝，孝親之道
2	膳斥鮑魚	3a-4b	周文王周武王	輔育太子之道，非禮之食不可以養太子
3	振貸貧民	5a-6b	周文王	為天下之道，勿因君主之貪欲而使天下貧困
4	丹書受戒	7a-8b	周武王	治國之道，亦有崇師尊訓之意
5	聽朝四輔	9a-10b	周成王	君臣之道，善用輔佐之臣
6	桐葉封虞	11a-12b	周成王	為君之道，君無戲言
7	亟用賢人	13a-14b	齊桓公	治國之道，果斷而善用賢者
8	戒君節飲	15a-16b	齊桓公	君臣之道，人臣諫誡為君者宜燕息有度
9	善言格天	17a-18b	宋景公	治國之道，為君者愛民惜臣而至誠感天，頗類於《帝鑑圖說》中的〈德滅祥桑〉
10	自結履繫	19a-20b	晉文公	君臣之道，敬禮人臣
11	夫婦如賓	21a-22b	晉文公	夫婦之道，然以此而識人舉賢
12	託相獻規	23a-24b	楚莊王	君臣之道，善納賢者之建言
13	廷理執法	25a-26b	楚莊王與其太子	治國之道，太子犯法遭處罰而能虛心受教
14	仁言動眾	27a-28b	楚王	領軍之道
15	因樂求賢	29a-30b	晉悼公	輔育太子之道，以賢者為太子傅
第二冊				
16	得賢弭盜	31a-32b	晉侯	治國之道，善用賢者執政而盜賊逃逸
17	敲器示戒	33a-34b	孔子 宋真宗	為人處世之道，如何持盈守滿，擇中道而行
18	金人示戒	35a-36b	孔子	為人處世之道，慎言謹行
19	賤貨尊賢	37a-38b	王孫圉（楚臣）	治國之道，重賢人而輕寶貨
20	泣思直臣	39a-40b	趙簡子	君臣之道，主明臣直，鼓勵人臣諫上
21	詢求政術	41a-42b	董安于（趙簡子之臣）	治國之道，詢問為政之道
22	誅絕佞人	43a-44b	趙簡子	君臣之道，將佞臣沈於河
23	咨訪相材	45a-46b	魏文侯	治國之道，進賢為相而不以親屬為之
24	式閭禮士	47a-48b	魏文侯	治國之道，敬禮賢者而竟以退兵
25	政術諭下	49a-50b	魏文侯	治國之道，教臣以治理之道
26	雨不失期	51a-52b	魏文侯	君臣之道，君不失信於臣
27	旌賢去姦	53a-54b	齊威王	治國之道，人君能辨忠奸並予以獎懲
28	敝褫待功	55a-56b	韓昭侯	治國之道，不輕易賞賜，有功方賞
29	井窺示警	57a-58b	列精子高（齊湣王時）	君臣之道，諭人君當以臣為鏡以知己過，頗有以史為鏡、以人為鏡之勸
30	教子務學	59a-60b	漢高帝	輔育太子之道，訓誡太子當務於學

第三冊				
31	條陳故事	61a-62b	漢宣帝時宰相	治國之道，條陳故事作為施政準則 焦竑以此自況？
32	嘉獎勤學	63a-64b	漢孝哀帝為定陶王時	學習之道，獎勵勤學，鼓吹學習文辭與法律
33	下車問疾	65a-66b	桓榮、漢光武帝之太子 (漢明帝)	君臣與師徒相處之道，尊師之舉，亦見君臣師徒之情，特別強調敬師與勤學之重要，同時又再次的提及學習春秋之重要
34	遣使質疑	67a-68b	包咸、漢顯宗 (漢明帝)	學習之道，勤學問經禮遇舊師；又列明代諸帝問經之事
35	愛惜郎官	69a-70b	東漢明帝	治國之道，因愛民而不輕易許以官職
36	託物喻政	71a-72b	龐參、任棠 (東漢安帝時)	治國之道，賢官訪隱士以求治道；引申為古之治者均有師承
37	禮聘遺賢	73a-74b	東漢順帝、樊英	治國之道，禮聘賢者，引明太祖禮聘賢者之事
38	師事名賢	75a-76b	郭泰、魏照 (東漢靈帝時)	學習之道，經師易得人師難尋
39	教子讀書	77a-78b	劉備、劉禪	學習之道，訓誡其子讀書也強調因材施教、因時施教
40	傷指自悲	79a-80b	范宣(晉人)	孝道
41	運磚習勞	81a-82b	陶侃(晉人)	強身之道，鍛鍊體魄以備戰時
42	不賣的盧	83a-84b	庾亮(晉人)	為人處世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43	觀穫進規	85a-86b	范雲、南齊文惠太子	治國之道，稼穡之艱，引明太祖畫有圖繪以示王業艱難
44	投籤警寐	87a-88b	陳文帝	聖君當自強不息；以明太祖為例
45	弓矢喻政	89a-90b	唐太宗	君臣之道，賢君當求諫言

第四冊				
46	闢館親賢	91a-92b	唐太宗	學習之道，勤奮講學親近賢者，文後特別提出人臣講讀的責任
47	習射殿廷	93a-94b	唐太宗	強身與治國之道，獎勵習武加強武備
48	崇師問道	95a-96b	魏王 秦王珪唐太宗	學習之道，崇敬師尊問忠孝之道
49	上書減膳	97a-98b	孝敬太子 唐高宗 邢文偉	學習之道，典膳官以減膳為諫
50	觀圖自警	99a-100b	唐玄宗 宋璟	治國之道，藉無逸圖自我警戒，引先治後衰之例
51	煮藥燃鬚	101a-102b	唐玄宗	友愛兄弟
52	克己任賢	103a-104b	唐玄宗 韓休	治國之道，以賢臣警戒，再申先治後衰之意
53	獎勸循良	105a-106b	唐玄宗 張說	治國之道，任賢為地方官，頗有以古喻今之意
54	樂受格言	107a-108b	宋太祖 王昭素	治國之道，訪賢且書治國養身之理於几屏以自警
55	散遣宮人	109a-110b	宋太祖	治國之道，放遣宮人仁心治國
56	遵守舊章	111a-112b	趙普 (宋太祖相) 李沆	治國之道，不復無益之進言，引明太祖訂有變亂祖宗成法者罪在不赦之言
57	論字知非	113a-114b	王旦 張士遜 (宋仁宗為太子時)	治國之道，為君者當修身治國而不溺於其所好，以梁蕭繹與宋文帝嗜文藝為戒
58	常讀論語	115a-116b	李沆(宋相)	學習之道，讀聖人言以興治道；讀書之為用
59	焚香告天	117a-118b	趙抃 (宋仁宗相)	君臣之道，為人臣之道
60	借事納忠	119a-120b	王曾 (宋仁宗時)	君臣之道，進用賢臣，臣進古聖賢事蹟圖以獻，焦竑用以自況

(責任編輯：陳卉秀)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元) 王惲

《欽定元王惲承華事略補圖》，現代重刊清本，收於劉托、孟白編，《清殿版畫匯刊》，冊14，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1966。

(明) 沈德符

《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 紀昀等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明) 孫承澤

《春明夢餘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明) 祝世祿

〈養正圖解序〉，收於(明)焦竑，《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1a-3b。

(清) 張廷玉等著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明) 張居正編

《帝鑑圖說》，現代重刊明代郭庭梧刊本，《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1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明) 焦竑

《養正圖解》，現代重印清光緒21年本，收於劉托、孟白主編，《清殿版畫匯刊》，冊14，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

《養正圖解》，清光緒21年重刊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詳見China-US Million Book Digital Library Project (CADAL)網站，2012/8/14查閱，<http://archive.org/details/02091790.cn>。

《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代吳懷讓本(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16750號)，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

《養正圖解》，現代重刊宛委別藏本，收入於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宛委別藏》，冊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李劍雄點校

《澹園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

(明) 鄭紀

〈進聖功圖說以輔養皇儲〉，《東園文集》，卷3，頁8b-13a，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

(明) 霍韜

《渭涯文集》，現代影印明萬曆四年序刊本，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

(宋) 謝枋得註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上卷)，據明代內府刊本複製，臺北：世界書局，2009。

## 近人論著

小林宏光

1990 〈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期，2月，頁11-31。

山崎純一

1996-1997 《列女伝》，東京：明治書院。

王鏡輪

2005 《做一個皇帝讀書郎：從太子到天子的學習之路》，北京：華藝出版社。

石守謙

1987 〈南宋的兩種規鑒畫〉，《藝術學》，1期，3月，頁7-39。

李焯然

1982 〈焦竑之史學思想〉，《書目季刊》，卷15，4期，頁33-46。

李劍雄

1998 《焦竑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焦竑的生平、思想與著作〉，收於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上)，北京：中華書局，頁1-23。

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編

1990 《近世日本繪畫と畫譜・繪手本展》，町田市：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

板倉聖哲

2004 〈馬麟『夕陽山水圖』の成立と変容〉，《美術史論叢》，20期，頁1-31。

板倉聖哲編

2004 《南宋繪畫—才情雅致の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

周蕪

1984 《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林麗江

2007 《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報告(NSC 93-2411-H-003-035-) 國科會網站：<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韋慶遠

1999 《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芳榮

2011 〈養正圖解〉、〈故紙堆蠹魚（部落格）〉，查閱於2012/8/15：<http://www.wretch.cc/blog/fryuan1954/12366991>。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1998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第一冊，臺北：國家圖書館。

莊慧敏

2004 《〈帝鑑圖說〉與《養正圖解》之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建崑

1993 〈焦竑文教事業考述〉，《東海學報》，34卷，頁79-98。許建崑也把此文登在上其網站，見許氏著，〈焦竑評傳〉（一）、（二）、（三）（登於2005/5/27，於2012/8/16查閱：[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3](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3)、[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7](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7)、[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9](http://www.wretch.cc/blog/xuxuxu&article_id=1670999)）。

陳生璽、賈乃謙

1996 《帝鑑圖說評注》，鄭州：鄭州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高華編

1984 《宋遼金畫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

黃仁宇

首版1985，增訂版2001《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

鄭振鐸

1983 《劫中得書續記》，收於《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

鄭婷婷

2013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版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Ch'ien, Edward T.

1986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dderose, Lothar

1998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n, Li-chiang

2008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pp. 321-359.

- Forthcoming “Wang Tingna Unveiled—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95.
- McCausland, Shane ed.  
2003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deals of Etiquette, Art and Empire from Early Chin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ns Ltd.
- McCausland, Shane et al  
2003 *First Masterpiece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Admonitions Scroll*,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Murray, Julia K.  
2001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jian tu shuo /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pp. 65-101.  
2005 “Didactic Illustrations in Printed Books,”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A., C.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17-450.  
2006A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e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no.1 (Spring 2006), pp. 20-67.  
2006B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in Ming Wilson and Stacey Pierson ed.,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Colloquy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23,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pp. 139-157.  
2007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David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231-268.
- Oertling, Sewall Jerome  
1980 “Ting Yun-P’eng: A Chinese Artis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 Yü, Ying-shih  
1988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ited,” *Ming Studies* 25, pp. 24-66(43).

## 圖版出處

- 圖1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玩虎軒刊本，大英博物館藏。攝自 Julia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in Ming Wilson and Stacey Pierson ed.,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Colloquy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23*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6), p. 141, Fig. 2.
- 圖2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蓋公堂刊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3 〈金人示戒〉，《養正圖解》(第18則，頁35a)，玩虎軒刊本，大英博物館藏。攝自 Julia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3, Fig. 6.
- 圖4 〈金人示戒〉，《養正圖解》(第18則，頁35a)，蓋公堂刊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5 〈戒君節飲〉，《養正圖解》(第8則，頁15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6 〈戒君節飲〉，《養正圖解》(第8則，頁15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攝自焦竑撰，《養正圖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15a。
- 圖7 〈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8 〈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攝自焦竑撰，《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5a。
- 圖9 〈善言格天〉，《養正圖解》(第9則，頁17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10 〈善言格天〉，《養正圖解》(第9則，頁17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攝自焦竑撰，《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17a。
- 圖11 〈女史箴〉局部，顧愷之，卷，絹本設色，24.8×348.2公分，大英博物館藏。攝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 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臺北：錦繡，1993)，頁121。
- 圖12 〈洛神圖〉，(元)衛九鼎，軸，紙本水墨，90.8×31.8公分，臺北故宮藏。攝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頁107。
- 圖13 〈墨精〉，《方氏墨譜》，攝自《方氏墨譜》(現代重刊明本，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3，頁7。

- 圖14 〈聽朝四輔〉，《養正圖解》(第5則，頁9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 16750號。攝自焦竑撰，《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9a。
- 圖15 〈聽朝四輔〉，《養正圖解》(第5則，頁9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16 〈周舍〉，《人鏡陽秋》(卷3，頁7b-8a)，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特此誌謝。
- 圖17 〈泣思直臣〉，《養正圖解》(第20則，頁39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18 《元本出相西廂記》插圖，汪耕繪圖，黃應岳刻，玩虎軒刊本。攝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0版畫》(臺北：錦繡，1994)，頁88。
- 圖19 〈詢求政術〉，《養正圖解》(第21則，頁41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 圖20 〈詢求政術〉，《養正圖解》(第21則，頁41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21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 16750號。攝自焦竑撰，《養正圖解》(現代重刊明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3a。
- 圖22 〈青玉案〉，《方氏墨譜》，攝自《方氏墨譜》(現代重刊明本，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3，頁19a。
- 圖23 〈不賣的盧〉，《養正圖解》(第42則，頁8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 圖24 〈照夜白〉，韓幹，卷，紙本設色，30.8×33.5，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攝自Richard Barnhart, Yang Xin, Nie Chongzheng, James Cahill, Lang Shaojun, Hung Wu,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7), p. 81.
- 圖25 〈亟用賢人〉，《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 圖26 〈亟用賢人〉，《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 圖27 〈亟用賢人〉局部，《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
- 圖28 〈亟用賢人〉局部，《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 圖29 《夕陽山水》，馬麟，絹本設色，軸，51.5×27.0公分，1254年，根津美術館藏。攝自根津美術館編，《南宋繪畫：才情雅致の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圖27。



圖1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玩虎軒刊本，大英博物館藏。攝自 Julia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1, Fig. 2.



圖2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蓋公堂刊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3 〈金人示戒〉，《養正圖解》（第18則，頁35a），玩虎軒刊本，大英博物館藏。攝自 Julia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p. 143, Fig. 6.



圖4 〈金人示戒〉，《養正圖解》（第18則，頁35a），蓋公堂刊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5 〈戒君節飲〉，《養正圖解》（第8則，頁15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6 〈戒君節飲〉，《養正圖解》（第8則，頁15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



圖7 〈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8 〈振貸貧民〉，《養正圖解》（第3則，頁5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



圖9 〈善言格天〉，《養正圖解》（第9則，頁17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10 〈善言格天〉，《養正圖解》（第9則，頁17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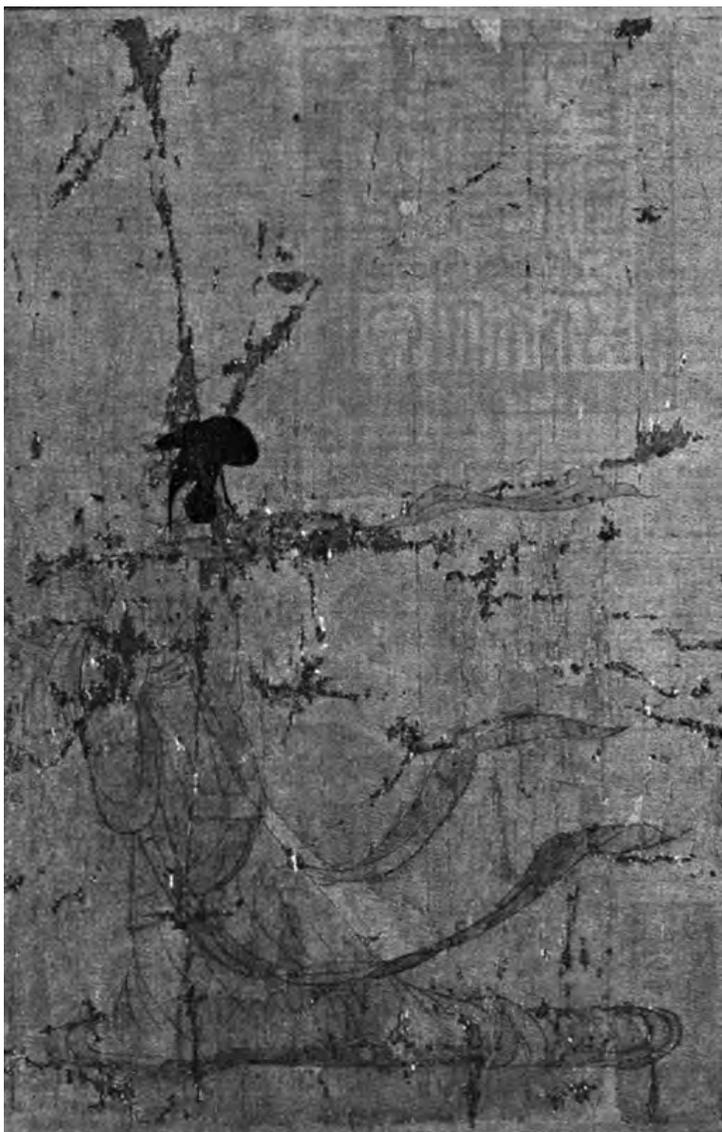


圖11 〈女史箴〉局部，顧愷之，卷，絹本設色，24.8×348.2公分，大英博物館藏。



圖12 〈洛神圖〉，（元）衛九鼎，軸，紙本水墨，90.8×31.8公分，臺北故宮藏。



圖13 〈墨精〉，《方氏墨譜》，卷3，頁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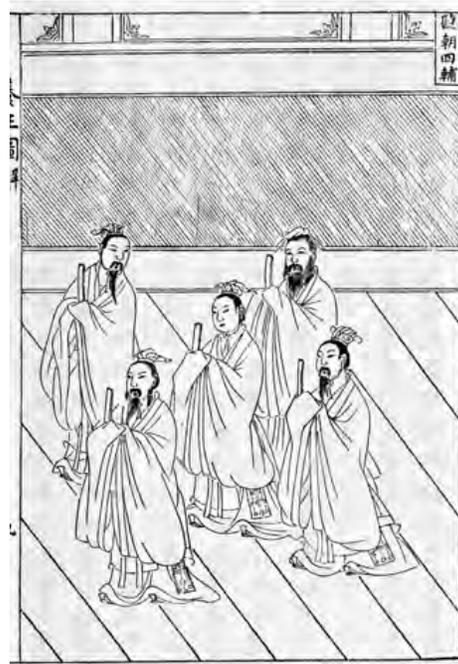


圖14 〈聽朝四輔〉，《養正圖解》（第5則，頁9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



圖15 〈聽朝四輔〉，《養正圖解》（第5則，頁9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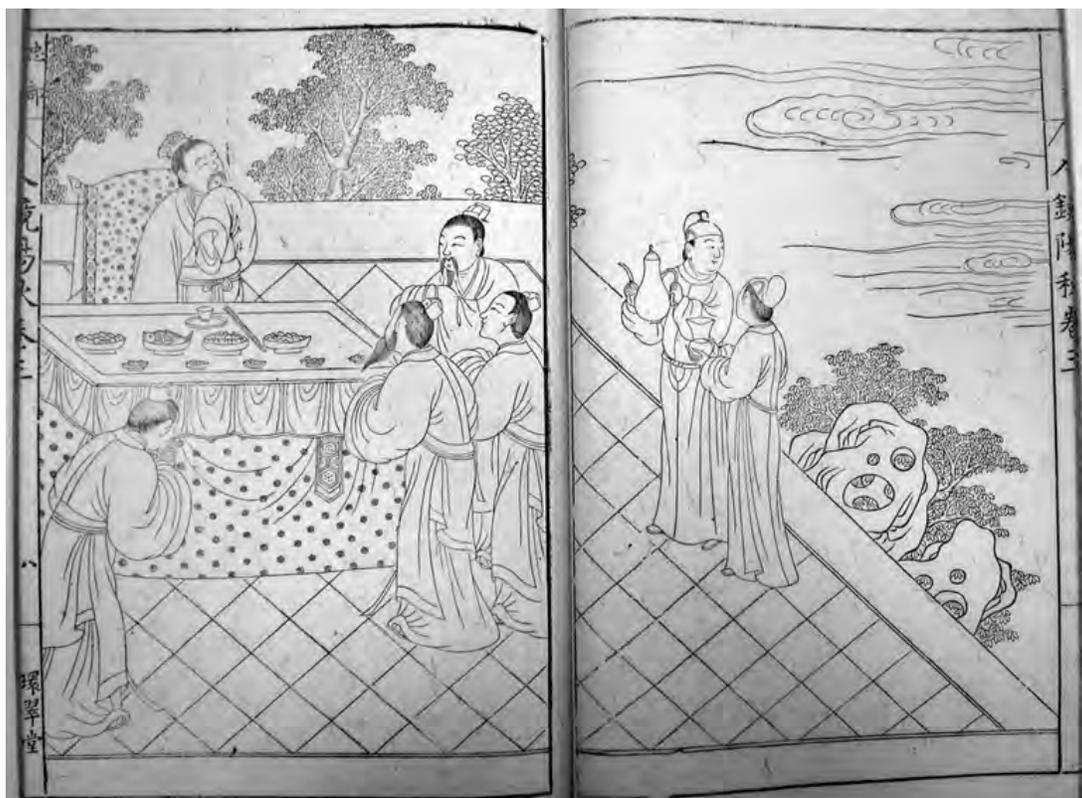


圖16 〈周舍〉，《人鏡陽秋》（卷3，頁7b-8a），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特此誌謝。



圖17 〈泣思直臣〉《養正圖解》（第20則，頁39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18 《元本出相西廂記》插圖，汪耕繪圖，黃應岳刻，玩虎軒刊本。



圖19 〈詢求政術〉，《養正圖解》（第21則，頁41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圖20 〈詢求政術〉，《養正圖解》（第21則，頁41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21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第2則，頁3a），吳懷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16750號。



圖22 〈青玉案〉，《方氏墨譜》，卷3，頁19a。



圖23 〈不賣的盧〉，《養正圖解》（第42則，頁8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圖24 〈照夜白〉，韓幹，卷，紙本設色，30.8×33.5，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25 〈用賢人〉，《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特此誌謝。



圖26 〈用賢人〉，《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特此誌謝。



圖27 〈亟用賢人〉局部，《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吳懷讓刊本，上海博物館藏。



圖28 〈亟用賢人〉局部，《養正圖解》（第7則，頁13a），蓋公堂刊本（原玩虎軒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圖29 《夕陽山水》，馬麟，絹本設色，軸，51.5×27.0公分，1254年，根津美術館藏。